

中央施壓

迫港府立法



反對23條立法

燒諮詢文件

反對立法

高官問責制自露出是對市民卸責制

如何應對失業問題？「一邊一國論」出台

生產安全 難有保障 俄國工人接管工廠

美帝往何處去？ 巴西舉行世界社會論壇

全球化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

沉痛悼念張明戰士（1922-2002）

沉痛悼念張明戰士（1922-2002）

十月評論社同人

本社同人的親密合作者張明戰友，非常不幸地因病醫治無效，卒於日前永遠離開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了！失去了這樣一位長期為改造不合理社會而堅強不屈、艱苦奮鬥的摯友，我們感到極之悲痛！

張明摯友出身於中國廣東省中山縣一窮苦農村，在抗日戰爭初期便獻身於抗日工作，與同鄉青年一起組織了象角青年戰時服務團，積極從事抗日宣傳，發動群眾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山淪陷後，他們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繼續與群眾一起向日帝漢奸政府進行抗爭。

後來，他去香港入工廠做工人，數年後轉到淪陷了的省會廣州市，在五仙門發電廠工作，與工友們打成一片，熱心幫助工友，負責多種職務，發揚忘我精神，很受工人愛戴；在國民黨撤退出廣州前，他組織並領導護廠糾察隊，以保護國家財產，防阻電力設備被蔣介石軍隊破壞及搶去。

廣州解放後，因難見容於一些與他政見不同的「新貴」，無法繼續留在廣州，被迫再到香港，在電話公司工作，曾參加過洋酒工會。

總觀他從鄉村到城市工作這個長期間，他幾乎都是在工人環境中生活、學習，與工友們建立起良好關係，吸取他們的優點，培養無產階級意識，成為堅強的鬥士。

1974年，《十月評論》創刊，他是創辦人和編輯成員之一，負責草擬了當時刊出的《我們的立場》，以及後來的部份社論，並以秋君、林一峰等筆名，陸續撰寫出許多珍貴的重要論述（例如《毛澤東主義的興起與沒落》，刊於本刊總第113期）。

很不幸的，主要由於處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加上工作繁重，以致他的健康隨年歲增長而日益變壞，特別是患有多種疾病，病勢日趨嚴重，終告不治。

我們在非常悲痛之餘，誠懇希望關心社會和國家大事的年青人，能夠從張明畢生的堅強奮鬥、服務人群、當仁不讓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中得到啓示和激勵，接續他的遺志，為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社會共同努力！

2002年9月25日

反對23條立法

本刊評論員

在北京高官多次公開催促23條立法的巨大壓力之下，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它立即引起了廣大市民和輿論等方面的很大反應，也引起了外國傳媒的猛烈抨擊和在港外商的「關注」。市民等質疑，回歸後5年多沒有出現過顛覆中央或分裂國家的活動甚至跡象，社會、政治各方面都一直正常地安定，根本不需要在現有的防止和懲治罪行等條例有效地施行的現狀下，再增加這樣非常

嚴苛的立法。而且，這個諮詢文件內容措詞充滿含糊空泛、到處存在地雷陷阱，使得廣大市民隨時有誤觸地雷、跌入陷阱的危險，從而會遭到終身監禁的最高刑罰。因此，許多市民（包括法律界人士）和傳媒都很快表態加以反對，認為沒有必要制定這樣的法例。《十月評論》過去也表示過沒有必要為第23條立法，尤其是對今天這個諮詢文件的意見，也同上述的公眾的意見相若，反對立法，尤其是這樣子的立法。

公眾，特別是法律界、報章評論認為，如果今天一定要23條立法，也不應又像這個諮詢文件大致相同地寫成修改條文須經立法會逐條通過的藍紙草案再作有限期諮詢，和提交立法會討論通過；而應寫成包含具體清晰法律條文的白紙草案供公眾研究和討論，同時必須有充分的諮詢期間。

但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她已經赴京同中央取得共識，必須在明年（03年）6月底完成這項立法，翌日（7月1日）起公佈施行。時間表已定，不能同意上述的公眾要求，寫成白紙草案延長諮詢時間。如此看來，既然公佈前已經同中央高層決定了文件內容和立法期限（這其實應該說是聽取了中央指示），就一定要全部忠實地予以執行；這反映出向公眾諮詢只是虛假的敷衍手法，諮詢到的民意即使絕大多數質疑，不同意以至反對，或者提出建議，當局都將會拒絕接受。

事實發展倘將如此不幸言中，那就會將內地一貫施行的嚴厲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加緊控制人民等一套逐步推行於香港，使一國兩制逐步趨於一國一制化，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規定及承諾將被違反。結果將會是，全港市民一向享有的自由權利遭到嚴重剝奪、損害，現有的一些團體可能被藉詞取締，而香港的國際形象也會受到很壞影響，對香港的經濟、政治等的評級也會被相應地降低，而且會增加外商的疑慮，甚至減少在港投資。特別重要的是加劇香港的經濟困難和失業。

提出立法的7宗罪

該文件列出的政府準備立法新增或修正的「7宗罪」，除了「叛國罪」判終身監禁在此暫不評論之外，其餘6宗罪現根據諮詢文件分別加以評述如下：

一、在現行法例外新增加的顛覆罪，文件建議的罪狀包括：A，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脅迫中國或推翻中國，或廢除中國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B、企圖協助教唆或慫恿者亦屬犯法。這些所謂「威脅」、「企圖」，並不是確鑿的事實表現，而是其他人主觀上的認定，可以被任意引伸而作出的。這樣含糊的罪名，也使得支聯會在每年遊行集會中與市民一起喊出「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的呼聲，都可能被無限上綱地扣上罪名，因

為一黨專政正是中共利用憲法規定的由中共領導國家的制度；而中共領導層當年的鎮壓也是「合法、合理」，不容追究、翻案的。

二、另一項新增的分裂國家罪是指：A，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抗拒中央政府對中國的一部份行使主權……；B，企圖干犯、協助教唆或慫恿他人干犯分裂國家的實際罪行。這裡也和上面所說的相若，仍是「威脅」或「企圖」那樣做，又可任由別人隨其主觀願望而作出認定，便構成罪名，而不需要明確定事實作為證據。

上述兩項的「威脅使用武力」，可被引伸到涵蓋很廣泛的行為，包括例如騷亂者燒毀一輛汽車，也可無限引伸地套上「危害國家」的罪名。

三、煽動暴亂罪，它建議：把現有的「處理煽動刊物、煽動他人干犯叛逆罪」，擴大為「煽動他人干犯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罪」，而且，引伸為「明知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而沒有合理辯解處理煽動刊物」，「管有煽動刊物」，也同樣擴大而加上上述的罪名。這對於現行的新聞出版自由是非常嚴苛的限制，給新聞工作者、報刊有關負責人士等等，增加極大的恐懼感，害怕誤觸地雷，動輒有官非以至被終身監禁的危險。由此產生的結果，將會是限制了新聞自由，使工作人士盡可能少作評論、少揭露陰暗面事實，等等，市民知的權利也勢將被大大削減。

它建議廢除現行起訴期限，亦即對於久遠舊事仍有追溯力檢控煽動叛亂和叛國。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規定，對叛逆等罪名的檢控，必須在犯罪後3年內展開；煽動罪更須在犯罪後6個月內提控。而諮詢文件則提議廢除這些時限規定，亦即取消了現行條例對防止「秋後算賬」的保障。

四、所提議的竊取國家機密罪，是指未經授權而披露未獲授權取得的受保護資料，而受保護的範圍包括：保安及情報、財務、國際關係、「中港關係」、以及有關罪行和刑事調查的資料。這裡列出的範圍已經非常廣泛，還有其他未列出包括在內、將來仍可隨意增加的。香港傳媒從中外報刊、電訊所得而刊登或轉載的資料，都可能被扣上「竊取」未經授權而披露國家機密的罪名，使得新聞工作者等無所適從，結果可能因懼怕誤觸地雷而不予刊載，較「安全」的是採用內地官方發出的資料，逐漸變成為官方的喉舌和宣

傳工具。發展到這種情勢，將會比國內的非官方報刊還不如，它們已經爭取到可刊出那些自己取得而未經官方授權披露的資料，有限度地發表獨自的評論。

五及六、它所定出的支援被禁制的「外國政治性組織」，以及與之聯繫，均屬有罪。所指的「被禁制」組織是由中央政府取締了的。與它有從屬關係的聯繫，在財政上支援、資助它，便構成犯罪，需監禁7年。

這些罪名，首當其衝的會是香港的法輪功組織及其人員。他們將會被扣上這些「罪名」，而取消其在香港的現有合法地位，負責人也有被判囚7年的可能。其餘一些組織也很可能難避過這種災難！

它建議授予警方額外權力，可以濫權地不需法官預先批准取得搜查令，便由警司派員入屋搜查。香港現時法例即使對很多嚴重罪行，也沒有賦予警方權力於緊急情況下入屋搜查，何況所提及的罪行很多都涉及終身監禁刑罰，這更必要在執法的程序上作出相當保障。同時，文件也沒有提出理據支持警方這樣做。這就是取消了現行有關法例規定的市民免於恐懼及不

受騷擾的自由的保障。

審判由政府委派的法官單獨進行，沒有陪審團參加、提出意見，供法官循慣例依陪審員多數意見來判決。這樣對被告將有可能更加不利。

從以上引述的該文件「建議」立法的籠統內容可以看到，如果依高官的強硬表態和文件的建議全部落實，則香港市民現有的一切自由、人權等權益將會遭到嚴重的削弱、損害。特首聲稱立法「絕對不會減少市民現時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權，亦絕對不會影響我們現有的生活方式」，未來的實際發展將可證明這個承諾到底有多少能兌現！

這項立法直接關係到全港市民的切身利益和實際生活，市民必需起來踴躍發表意見，積極提出建議要求，匯合成集體意見，構成絕大多數市民的意見，提供當局採納，作為根據寫成白紙草案，這樣才能有力地、有效地改變政府的強硬做法，阻止最不幸的發展降臨，繼續維護市民的自由、人權和社會利益！

2002年9月28日

高官問責制自露出是對市民卸責制

振言

問責制的高官由董建華一手委出後，已經出台兩個多月了。除了5名新委任的富商、學者外，其餘9名都是原有高官，後者佔了整個班子將近3分之2大多數（還有10多名現時改任常務秘書長也是舊班子的高層負責人。）既然原有眾高官被視為沒有出力協助董建華，以致錢其琛公開宣稱董5年來都是「孤家一人」作戰，那麼，是否改為問責制，就可從根本改變局面，而特首領導無方，施政無能，也能完全改好呢？這個問責制真有如此神奇的效力？！

其實，這個問責制只是對特首一人負責，而不會對全港市民和立法會問責，除董以外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它。有理由預料，除了對董負責之外，它的可見到的作用是：幾名工商富人參加了港府的領導層

後，可以加強官商勾結、互相利用和合作，更有力地影響港府政策的制定施行，更好地謀取工商富人的利益。

問責制開鑼不久，便遭遇到無情的考驗，暴露出它實際上是對市民卸責制（正如不少學者和報章評論所指出的），高官犯了錯誤也不承認、不願負責，反而推卸給別人：這是它成立不到一個月爆發的細價股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港交所突然宣佈細價股除牌的建議，致使無數小股東趕忙賤價拋售手上的細價股，損失非常慘重。

股災爆發前後的有關高官表現

財經事務局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在7月17日已

由其秘書將港交所證監會文件放在其辦公桌上，在25日股災發生後翌日，他再得到一份副本。但身為財經事務的直接負責人，卻表示自己與事件無關，他只知有除牌政策，不知道政策的詳細內容。兩日後在立法會議員追問下，他才說事前曾收過諮詢文件的撮要，只是沒有時間閱讀；他更怪業界人士沒有及時向他作預警，以致他沒有察覺文件的破壞性。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至少是沒有清楚了解事件的情況（據馬時亨說是他向梁錦松「誤報」了），便急忙公開地說政府事前並不知道此事，企圖把責任全部推在港交所頭上，要追究有否人須負責任。這等於說，他自己對此股災也不需負任何責任。但資料表明，梁馬兩人曾在7月28日會商對策，如果馬當時沒有告知梁有關事實，便是馬對梁隱瞞，其誠信便令人質疑。如果梁已知道，而作為馬的直接上司，財政事務的最高負責人，他卻沒有提出意見以至阻止，梁便也有責任，會成為失職了。

另外，證監會主席沈聯濤曾推說：「沒有同港交所談過一個除牌價」（但其後，鄭其志表示曾就除牌與證監會多番商討）。

以上這些負責財經的主要高官和證監會主席的說話，明顯表現出他們都在設法推卸責任，企圖保住自己的聲譽和職位，維護港府和高官問責制的權威。

調查小組的報告

由財政司司長自己委任的兩人調查小組的報告，認為港交所要負主要責任，其總裁和上市科總監都有責任；直接監管它的財經事務局長馬時亨則沒有失職，只是沒有預先審閱諮詢文件，7月31日在立法會上表現欠佳，上任後未適應職務，與下屬溝通出現問題，更高的監管人財政司長梁錦松也沒有失職。這就是說，他們都沒有政策上、行政上的錯誤和責任，沒有像西方國家的責任內閣所採行的「公眾管治」文化，即，不管是否部長經手做的，只要是在自己職責範圍內，所管轄的人出了錯，部長都要負責，甚至總理也有責任。

《報告》這樣輕描淡寫的、沒有交代有關問責局長的責任，迴避了重要問題；顯出客觀上是為有關高官塗脂抹粉。但特首對這樣的《報告》卻表示完全接受。

對於上述馬時亨在股災後的講話，尤其是馬在立法會上議員追問才承認事前有收文件，這怎會只是「表現欠佳」的缺點，而不是失職、其誠信應遭到質疑？既然特首揀選他為負責局長，又高度讚過他和其他局長是能幹的合適人選，而現在卻暴露出他至少是能力和經驗不足，這不是擇人不當、不應就如此讓他再任下去嗎？但如果調查報告能夠全面客觀地如實指出有關高官的責任，就可能大大損害剛開始運作的問責制（及特首）形象，使港人更加質疑問責制的價值。可能由於這種原因，《報告》便表現出像一些輿論所批評的「太溫和」，對高官「太友善」；難怪《報告》引起社會人士（包括受損失的小股民）普遍的不同意和不滿。據《星島日報》委託調查公司調查所得，有8成受訪港人不同意《報告》指「沒有官員需要負責任」；《東方日報》民調有63%認為不僅僅是鄭其志須負責任，等等，可以反映出絕大多數港人的反應。

馬時亨的反應

馬時亨在報告公佈後，知自己被開脫了罪責，便把原本準備向港人道歉，也不做了。但在報告引起普遍而強烈的（特別是對馬不滿意、憤怒和輿論抨擊，齊聲要他道歉，才迫使他公開道歉。而在召開政府記者會之前，只通知6個電子傳媒出席，不通知其他報章傳媒。這種歧視性安排是否要報復報章對他的揭露、抨擊呢？因此，記協等發共同聲明：這樣手法絕對不可以接受。由此更增加不滿，譏之為問責制下的新文化。港府新聞處處長為他辯解，又是因為馬到任不久，欠缺經驗。這些其實反映他沒有認識錯誤，沒有真正誠意認錯，而想敷衍了事。

馬時亨後來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依然極力強詞詭辯，謊稱把兩個文件混淆了，而且簡單答覆，公眾誤解；除牌諮詢文件是由港交所負責，政府不用事先審查諮詢文件。他以此繼續推卸其責任。梁錦松在同一會議上也表示，由於是前線監管者負責具體操作，他不需要看文件內容，使他不用負上政策及行政責任，推卻了財經最高領導人的責任。

這一切實際表現，連有關高官對董建華在去年《施政報告》中關於問責制的話，也根本不顧甚至違背了，《報告》說：

「這些官員各自負責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政策範疇，統領所轄部門的工作，制定政策、解釋政策、為政策作推介，爭取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持，並且為其政策的成敗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他們出席立法會會議，答覆質詢，提出法律草案和參與動議辯論。」

實行後問責高官在做些什麼？

問責制開始實行後，很多部長才著手擬定自己的工作計劃，更到各處訪問、「做騷」，有些卻趕著到海外渡假（馬時亨上任僅半個月，股災發生前不久，便休假到英國探女）；有些則為了表現自己，加緊推行他問責範圍內的政策措施。

例如，財政司長早前在接任開始就宣佈所有公務員都減薪4.75%，激發公務員非常普遍的反對，其後被迫降低對中下層減薪的幅度。最近他又提出要對港府各部門下年度少撥1.8%財政付款；倘若這樣不加反減並一刀切地實行，則勢必大大影響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教育等部門的服務，醫管局早前已實行不給貴價藥而要病人自購；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也跟著宣佈明年起會削減綜援金額一成，這將掀起其他部門跟風削減，使市民得不到應有的援助，更加雪上加霜，苦上加苦，推快貧者愈貧的惡化速度。

馬時亨也向各部門發出通知，要延遲或終止一些不必要的基本工程。這個措施又將與創造就業的目標背道而馳。

又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強硬地推行減薪，堅決拒絕與公務員工會代表會談，而定要由立法會內「保皇黨」等多數通過立法減薪，儘管公務員已表示同意減薪，但反對如此的立法。因而製造對立，激起公務員非常不滿，其中6萬人更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的無理立法，造成本港歷史上罕見的眾多公務員強烈反對政府這樣做。王永平以此導致政府與公務員之間關係嚴重惡化，士氣更加低落。

啟示和教訓

從眾高官對這些事件的處理表現，港人會得到什麼啟示和教訓呢？我們認為至少有：

第一，暴露了這個高官問責制的本質。

問責制高官全由特首挑選委任，他們是否負責任、有經驗能力和稱職？如果其中有些高官出了問題，暴露出他們不能達到上述的要求，就會否及時受

到批評，改正，願否接受正確批評，改正，又會否被處分直至撤職呢？這次事件已給了「否」的答案。其原因就是由於他們只由特首委任和只對後者負責。中國官場一直存有「官官相衛」的傳統，今天在香港也表現出是如此。如果不是這樣，特首起碼也會因擇人不當而須負上一定責任，影響他和政府以至這個問責制的形象。維護犯錯高官也可是維護他的「正確性」。因此，事件發生了將近兩個月，社會上爭議得如火如荼，他都沒有公開出聲，而顯出置身事外的樣子。與此相反的，假如像我們過去一直主張的一切主要官員都須經由全港市民民主選出，對市民負責，必須維護市民的權益，全心為市民服務，接受市民監督、批評，這樣便可防止官員任作亂為和犯錯，有錯即可迅速接受批評、改正，否則嚴重的便要加以相應的處理，處分，直至撤職。很不幸的，我們上述的主張沒有得到實施。

第二，二人調查小組《報告》表現得那樣「太溫和」、「太友善」等缺點，引起經由民調反映出的很大多數市民的不滿意、不同意，這與它的產生方法不無關係。這種調查本來最低限度須由現有的立法會所選出人員進行，超然獨立，與任何這事件有關及可能負有責任的高官全無關係。但結果當時立法會所提出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負責的建議，卻遭當局拒絕。而財政司長也應避免嫌疑、不予干預的。但他反而要由個人挑揀委派的兩名人士組成，這就難免引起市民的批評，以致有議員甚至評為「賊委警察捉賊」，（《星島日報》則以大字標題「賊喊捉賊」來報道此意見）。而兩人調查小組《報告》更擴大了有關事件的爭議，這種結果其實是可以避免發生的。

全體港人都有必要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致力於改革香港此種不合理政治體制。

對於股災事件，前述報告中還留下不少問題需要弄清楚、解答，以滿足全港市民的要求；也需要由另一個新的超然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去重新作出報告。這都必需依靠市民的努力去爭取得到的。

2002年9月20日

如何應對失業等嚴重問題？

微波

失業數字破本港歷史記錄

本港失業情況日益嚴重，失業率從去年1月的4.4%，逐月不斷上升至歷史新高峰，特別是在去年中以後，至今年7月已達7.8%，失業人數超過27萬，這還是政府統計處的官方數字（它通常都比一般預計的為低），而未列入的實際失業人數，當會更多得多。

就業不足（半失業）率則從去年初的2.5%上升至今年7月的2.8%，人數從8.5萬上升到10.8萬。即以官方的數字來說，也已打破香港的歷史記錄了。

今天，失業恐慌正籠罩著香港，有39%受訪的港人擔憂會被僱主解僱，成為亞太區13個國家及地區中最多人擔憂工作無保障的「亞洲之最」。這是國際調查公司AC尼爾森於7月訪問了區內8千名消費者所得的結果。（見8月8日《文匯報》）

許多原來有工作的失業者，到處尋找新工作卻都失敗，儘管他（她）們已不論工資比以前降低了一大截，也願意去做，但仍然很難再獲就業。

不少跨國公司在欠薪後，往往一走了之，使僱員無處申訴及追討。

大量的建築工人，為了保住工作機會，啞忍許多個月沒領到工資，使得判頭在層層剝削壓低工資的同時，乘機拖欠工資，有些達半年之久，不少判頭最後更以宣佈破產等手法，使工人「有汗出而無糧出」。港府及它所立的法例對他們竟無幫助，工人權益並無保障。即使有法例，也多漏洞，且執行不嚴，以致幾千工人欠薪達4千萬元。而尤其令人不滿的，是部份工人向判頭追討欠薪時，警方甚至站在資方和判頭一邊，拔槍指向工人，毆打及拘捕他們。

貧窮戶大增

港府各部門緊縮開支，推行外判制，更將使原有僱員大量失業。加上欠薪成風，香港生活費用又高踞世界首位，使情況更有如雪上加霜。本港工人處境的困苦由此可見一斑。

隨著失業、半失業大軍行列的不斷擴大，致使香港的貧窮人口日益增加。最新公佈的統計數字，又比以前估計更高出了許多。

根據統計處進行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至去年年初為止，全港共有45萬戶生活於貧窮線之下，佔全港住戶的28%，5年間貧窮家庭急劇增加了13%，惡化情況頗為嚴重。

城市大學在1999年9月至2001年初，訪問了3,086戶低收入家庭。研究發現，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住戶的人均總開支每月平均只得2,520元，食物的人均開支平均數是1,058元，貧窮戶普遍存在「縮食」情況，每人每天只有35元的食物開支，更有11萬的貧窮戶每人每天食物開支少於24元。

調查發現，有些貧窮戶連基本生活水平也因貧窮而受到影響，有近4成貧窮戶曾為節省金錢而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亦有二分一曾因經濟問題而經常不開燈以節省電費。研究更反映，有少數貧窮戶連醫療及食物等基本生存權利都不能維持，有6.8%的貧窮戶於過去一星期內最少有一餐未能食飽。

城大講師黃洪指出，貧窮戶中有57.7%，並沒有接受綜援及高齡津貼。他強調，這並非綜援金額較一般低薪勞工高，其實是現時低薪工人的工資已跌破「基本生活保障線」，令低薪工作無法養活自己及家人，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他指出，綜援金額仍然較他們計算出的「基本生活保障線」為低。調查還顯示，有71%的貧窮戶家中沒有任何來港不足7年的人士。

上述的調查是截至2001年初為止進行的，而那時以後至今20個月期間，失業率已從4.1%升至7.8%，失業人數則從14.3萬增加至27.5萬，即人數增加了將近1倍。這就顯示生活於貧窮線下的人口已經劇增，佔全港住戶的百分比也會大增了。

這些調查結果，以事實揭破了當局及其謀士、支持者所散佈的歪論，說領綜援金比去工作收入更高、綜援養懶人、大陸來港人士分薄了港人的福利，諸如此類。

特區政府和特首的應對

對於目前的嚴重失業和失業工人及普羅家庭的窮困，港府一些部門推出的緊縮開支措施，更加是對他們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打擊。例如，醫管局已開始實行部份不給藥而要病人自購，這將使許多貧苦病人無錢購買而失醫。又如中學畢業生因中六學額不足，會考成績略遜的幾萬名青少年雖渴望升學，但仍被拒於校門之

外，要找職業又非常困難找到，於是變成失學又失業的青少年。社會人士要求當局增加中六學額，而政府又不是難以做到的，但新任問責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斬釘截鐵地回應說：不會增加學額！

港府擁有非常巨額的財政盈餘和外匯儲備，原本可動用較多資源有效地解決當前失業和貧窮戶劇增的嚴重問題的（比如加多加快公共工程的建設，吸納大量的失業工人；設立失業援助金以稍解他們燃眉之急，等等）；同時，又應該提高溢利稅率和入息稅累進稅率，使盈利豐厚的工商企業、地產財團略盡「回饋社會」的責任，從而增加財政收入，以用於增加醫療、教育、公屋等的福利開支。但對於民間所提的上述辦法，港府都加以拒絕。

特首雖然一方面聲稱他是「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日日夜夜，連做夢也在想如何解決經濟、失業等問題；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實際表現卻大不相同。就以他在展開他第二屆任期的立法會答問大會的表現來看，他在開幕致詞中說過要「加強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後，民主黨的單仲偕議員就失業問題提出質詢，問董在首5年任期內，失業率大幅上升，會否自覺「很失敗」；又會否以5年內達至全民就業為施政目標？但董特首卻突然收起笑容，直言對單「好失望」，斥責單懂「彈」是沒用的，要有建議才行。而他隨後承認，對民主黨半年前向政府提交的改善經濟50項建議，他只「瞥」過一下。（7月9日《明報》報道）

他在答問大會上又拒絕訂下在任內失業率回落的措施，而且說，失業不是依靠一至兩個辦法得到解決，訂不出一個回落數字，而政府至今所提出的一些解決辦法，實際上收效不大，有些甚至幾乎是聊以塞責的。可能部份因為如此，工商及科技局長唐英年說：「自己有生之年也看不到失業率回復到97年的水平。」這也是對「明天會更好」宣傳的掌摑。

以下且讓我們舉些例子來看：

當局提請各商會屬下每家商號各招聘一名僱員，目標為2萬名，月薪則降低到幾千元，並勸告應徵者要大大降低要求，大學畢業生降到5、6千元也不計較。儘管如此，提出後多月，結果反應「不熱烈」，表示可能聘用幾百人，但薪金卻被乘機壓至非常低的水平。

勞工處提議現行的保安工作日夜兩更制改為3更制，工作時間從12小時縮成8小時。這樣的8小時本應是合理的、必需的，既符合國際上發達國家早已通行的8小時制規定，也可讓本港的失業工人獲得工作的機會。但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必須同時做到，那就是：不能相應地減低工資。否則，原有保安員收入大減，不夠開支，

又會去做兼職。港府作為全港最大的業主，有沒有帶頭明確宣佈改為3更制後不會相應地減薪呢？其他的私屋等管理層更會不會予以減薪呢？

政府推出的毅進、展能、青少年就業學習、僱員再培訓、副學士等計劃即使對部份失業、失學的青少年會有不同程度的幫助，但得益者難有很多，而且，在其中一種就讀的青少年認為學費要幾萬元，太貴難以負擔。

另一方面，在特區政府的偏幫、保護大企業機構、財團、地產集團的政策下，失業半失業者、貧苦階層，同其他的受薪人士幾乎一樣，要捱受高昂的生活費用，特別是屋租和交通費。儘管問責高官籲請三鐵和巴士公司直接減收車費，而它們的收費一直高昂，每年盈利豐厚（例如地鐵今年上半年盈利18.65億元），但這些壟斷或近乎壟斷的公共交通事業負責人仍然加以拒絕，而港府卻聽之任之。這也是港府不願設立票價調整機制政策的結果。

對於社會人士和團體重復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制，以保障工人生活，收入不致無限制地下跌，政府也堅持拒絕。

當局這許多偏幫資方的行徑，使資方等有恃無恐，得寸進尺，從而助長了勞資糾紛和失業危機。工人們眼見當局不會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知道必須靠自己力量才能爭取到，因而爆發出許多鬥爭行動。近幾月來，為追討欠薪、反對減薪或解僱的工人上街遊行、示威集會、集體與資方或判頭交涉等行動頻頻出現於不同的行業、公司，便顯現出工人的忍無可忍、必須用鬥爭去爭回權益的意志和決心，開啓出工人鬥爭可能重趨活躍的前景。

後記：

上文寫成送出後，當局最新公佈6至8月的失業數字，已較上一季下跌0.2%，即減為7.6%，但失業人數仍有27萬4千萬人，較上月初的失業數字僅縮減1千人。半失業率卻微升到2.9%。這表現出失業率有見頂回落的跡象，意味失業情況有機會穩定下來，但是以新就業的工資被大大壓低為代價的。而這也不意味香港經濟已走出困境、就業市場已開始好轉。如果美國及外圍的經濟再轉壞，影響香港經濟，或者，美國進攻伊拉克，使油價急升，將會使全球經濟再次陷於衰退，這些都會導致香港經濟惡化，因而失業情況會再趨嚴重。

9月20日

「一邊一國論」出台前後

軍行

態度的轉變

民進黨在1991年的第5屆黨代表大會上，壓倒性地通過在黨綱中增列「台獨條款」，即外界俗稱的「台獨黨綱」。這項增列的條款遭到北京方面的極猛烈抨擊。爲了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企圖化解大部份選民對台獨的疑慮，在1999年5月第8屆黨代會上，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主要內容包括：強調中國主張的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這篇決議即在最近仍由該黨主席陳水扁宣佈爲該黨對兩岸關係的最高指導原則。

陳水扁在8月3日進一步透過越洋視像向世界台灣聯合會年會致辭宣稱：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大家應該認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迫切性。他而且脫稿說：如果我們的善意不能獲得對岸中國相對的回應，就得認真思考，走自己的台灣的路。嗣後他闡釋台灣的路是民主、自由、人權、和平之路。在一邊一國論遭到北京等方面的抨擊、反對後，他再解釋其完整意思是「主權對等」論。

這些激烈言論，與他兩年多以來的較溫和講話有很大的改變。例如：

2000年5月20日，他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不宣佈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2002年5月9日，他在金門大膽島表示：兩岸近在咫尺，就好像鄰居一樣，願意邀請大陸領導人前來喝茶談天；兩岸重啓協商大門的第一步是互訪。

2002年7月30日，他在民進黨中執會上說：只要中共願意放棄對台動武，台灣不會改變既有的現狀。

改變的原因

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改變呢？這主要是因爲：

第一，是兩岸政權對立的矛盾加劇。在北京方面，它不願一直容忍像古語所說的自己臥榻之側讓別人酣睡的現狀：它很難在國內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

享有自由、民主和合理生活等方面與台灣相競爭；它要大力打擊，不斷以金錢外交把台灣所餘不多的「友邦國家」拉攏到大陸一邊，使台灣在外交上日益孤立，收窄其所稱的「國際生存空間」。最新的事例是，經過兩年來的外交拉鋸戰，北京終於把太平洋上只有一萬人口的瑙魯共和國從台灣搶走；而更加令陳水扁難堪的，是揀擇陳水扁就任民進黨主席、實行「黨政同步」的當天，在香港宣佈及簽署與瑙魯建交的聯合公報，後者則同時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由於台灣各個黨派力量的此消彼長不利於中共的統一目標，使中共更要盡力打擊民進黨，上述的偏偏要在同一天進行，就是這種意圖的表現之一。這樣反過來，陳水扁便更加不滿，要再三脫稿發出更強音。

第二，陳水扁及民進黨在遭到大力打壓下，不願在島內外人民面前示弱，這又與它逐漸成爲台灣第一大黨有關。民進黨勢力迅速膨脹，黨員由兩年前總統大選前的20萬人急增至目前的近50萬名。國民黨原稱有200萬黨員，在總統大選失利、交出執政權後，黨員劇減，它擔心今年底願交黨費的黨員恐怕將不到40萬人，這樣，將真正淪爲第二大黨：它近來由於經費拮据，大規模裁減黨工，引起黨內不滿及抗爭。親民黨目前號稱有10多萬黨員（1）。後兩者都難以阻遏民進黨的繼續得勢。陳水扁之提出「一邊一國論」，更是企圖爭取到更多住民支持和選票，以鞏固他和民進黨的權位。同時，陳水扁們相信，美國布殊政府的上台，對台灣政府是比前有利的。儘管布殊政府表示「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沒有改變，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同時指出這不等於反對台獨），但它對台灣現政權的實際支持力度仍比克林頓政府爲大，除了要加售先進武器給台灣外，最近，美國簽署了《2002財年補充撥款法》有關係款，企圖提升美台關係，從而引起中方的交涉，便顯示出這種美台關係的發展，助大了陳水扁們的膽子。

台灣民眾的反應

台灣住民對陳水扁新近講話的反應，使北京感覺到台灣局勢日漸失控的可能性會增加。

據台灣TVBS（無線衛星電視）民調中心8月4日抽樣調查了810位20歲以上台灣居民，結果發現，同意陳水扁所說的「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者達54%，不同意的只有29%，與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的支持度相若，當時支持「兩國論」的佔56%，不贊成的有22%。

TVBS民調還顯示，62%受訪者贊成就台灣前途進行公民投票，不贊成的只有29%。如果立即進行公投，在統、獨兩個選擇中，贊成獨立的佔45%，贊成統一的只有30%。跟前年4月28日陳水扁就任總統前夕的民調相比較，贊成獨立的比率已從15%明顯上升。今次調查未有列出「維持現狀」的選擇，按過去調查結果推測，相信仍會有多數人希望維持現狀。（2）

隨後，國民黨的台灣立法院黨團於8月9日公佈一份它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於所提問的應該維持現狀、獨立、統一的受訪者分別為54.83%、24.37%和12.93%；在它所設的「如果『公投』將帶來大陸武力威脅」（刊登中央社這項報道的8月10日《文匯報》標題把它改為「若有戰爭可能」）的前提下，表示不支持「一邊一國」及「公投立法」來決定台灣前途的，有44.89%，支持的有39.46%，兩者相差只有5.43%。由此可見，假如不設下這個假定的恐懼性前提，則支持的受訪者，可能會多於不支持的。而且，報道這消息的中央社電和《文匯報》並沒有提及受訪者有多少人及用何種方法進行。如果受訪者人數不多，或者受訪對象多是國民黨員或其支持者，則有關結果的代表性便會減少了。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承認：「近來一些民調指過半的民眾支持『一邊一國』，但這個問題只是『靜態地描寫台海的現狀』」（3）。這也表明過半數受訪民眾支持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是「近來一些民調」所得的結果，這比上引國民黨黨團的引導性民調結果會遠為客觀的。

北京繼續文攻武嚇

北京官方指責「陳水扁罔顧民意，鼓吹台獨，把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的圖謀強加給廣大台灣人民」；另方面卻激烈反對台灣「推動公投立法」。這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陳水扁意見實際上只反映很少數的意見，則「公投」肯定會多數反對他的台獨政策。但單是上述的民調結果，就可顯示北京官方

的上述說法只是黨八股陳腔濫調，不同於台灣的民意的。

北京方面對陳水扁公投主張的反對非常強烈，指他是將台灣引向災難。8月7日英文《中國日報》引述解放軍將領的話說，如果陳水扁持續企圖以公民投票實現台灣獨立，大陸對台動武的機會將增加；如果台獨分子利用公投將台灣分裂出去，軍方必須使用武力回應。（4）

除了強烈譴責陳水扁的有關談話外，京方又在台海進行攻佔台灣本島的大規模軍事演練，繼續它的文攻武嚇做法（這種武嚇姿態的反效果會增加台灣住民對北京的反感）；但卻避開批評陳水扁所提的走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和平之路，這樣的民主人權道路，是中共不願中國走上的。

正如前面所述的，北京一直在推行金錢外交政策，要用經援把台灣的邦交國陸續搶去；台灣當局也盡力用經援等企圖維持現有的友邦國家關係，抵拒北京的外交打壓，力爭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不再日益縮小。但它們雙方仍要互相指責對方不應搞金錢外交。

台灣民眾要走自己的道路

陳水扁態度比前強硬，部份原因也會認為北京方面不致因此而採取軍事進攻等異常激烈回應，後者現時正傾力於經濟發展、穩定政局、解決嚴重的失業等難題，而經濟發展又需要台灣資本家的大量投資和商務貿易，攻台戰爭定會打亂北京的對外開放發展等政策。因此，一邊一國論引起的政治風波暫時將不會擴大下去。

台灣民眾亟需聯合行動起來，迫使陳水扁實踐他所誇稱的「走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權之路，和平之路」的諾言，使之變成真正的現實，台灣民眾爭取到確實而充份地享有民主、自由、人權，進而掌握政治權力和工人掌管生產的權力，並以此協助大陸的同胞。

2002年8月26日

註釋：

- （1）7月29日《明報》。
- （2）8月6日《蘋果日報》。
- （3）（4）8月8日《明報》。

生產安全 難有保障

——兼評《生產安全法》

張開

多月以來，中國的重大工傷、特別是煤礦事故接連發生，更加吸引了國內外人士的關注。

筆者在兩年前，曾寫了《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一文（刊在《十月評論》總第202期），其中指出：中國加緊推行市場經濟，由於生產的目的是追求盡可能多的利潤，企業主和管理層都只重視生產、漠視安全，導致勞動安全衛生的「形勢嚴峻」，工傷和職業危害事故頻密發生。文內並詳細地列舉出傷亡事故的具體數字、例子（詳情請參閱該文）。

事故連年增多及其原因

隨著這種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生產傷亡等事故也與日俱增。據統計，2001年全國共發生傷亡事故100萬起，死亡13萬人，分別比上年上升20.5%和10.4%，其中工礦企業工傷事故11,402起，死亡12,554人。（1）

2002年1至5月，全國發生的各類事故和死亡人數，又比上年同期分別上升了9%和5.8%。（2）

《北京青年報》發表社評（題為《資本與權力結盟是礦難的罪魁禍首》），引述山西省委書記田成平在繁峙礦難現場憤怒地說：「這裡的生產自始至終都是違規的，沒有一個環節符合規定，安全會議開了不知多少次，許多工作到了基層卻難以落實。」也許人們感到困惑：為什麼安全會議不斷地開，拉網檢查不斷地搞，各種紅頭文件頻頻下發，卻始終無法杜絕違規開採的現象，無法避免重特大事故的發生？

該社評對其所提這問題的解答是：「礦難頻發，並不是我們缺乏好的政策，而是各種政策和法規難以落到實處」；基層政府的官員與礦主往往「同氣連枝」、利益相關，他們直接縱容了各種違章開採的進行，包庇了礦主的非法作業，一旦事故發生，他們又動用手中的權力遮掩事實真相。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利益裙帶關係」，那些基層官員當然會把省委書記的話當做耳邊風，把紅頭文件看做官樣文章，把拉網

檢查當做走過場，於是也就埋下了事故的隱患。（3）

這裡評說的雖是針對礦難，實際上也適用於全國其他的工業企業等的生產事故的。

該報和7月19日的《人民日報》等都報道了這種「難以落實」的具體情況。例如，不少省市有關負責人在近日召開的全國生產安全座談會上大吐苦水，說他們下了許多次的停產通知書，但幾乎都遭到拒絕執行，照舊違章生產，以致事故頻生。副總理吳邦國被引述的話是：「當前安全生產工作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嚴不起來，落實不下去。」（4）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表現之一，戮穿了中共誇稱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說法。這又再一次表明，中國存在的特權官僚與資本一經結合，便產生出比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更壞的現象，連帶使政府的管治權力陷於半癱瘓或局部癱瘓狀態。

在中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已經是存在已久、官方和人民都週知的事實。黨政高層在制定政策時，如果不同時包括落實有關政策、防止執行人員逃避執行的措施辦法，那就自行表明它不是好的政策。而且，就在該篇社評同一版上，有「舊模式已管不好市場經濟」的標題，並在文內報道需要有新的「一套形成系統化、程序化和具有自我約束、自我完善的科學管理體系。比如說，它要由領導和企業進行兩級承諾，並且由勞工組織這樣的第三方認證機構提前考核，不符合標準的有糾正和預防措施，還有風險評估和控制體系、安全信息網絡體系和救援等分支體系。」至今為止的舊模式、政策顯然是沒有這些的，這就表明它們已經「不合時宜」，並非好政策了。

《安全生產法》的實效不大

面對者日益嚴重的生產安全和上級當局工作「嚴不起來，落實不下去」的困局，全國人大常委會在6

月29日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將於今年1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列有報章一整版密密麻麻的小字共97條，據《人民日報》記者張強專文的簡介，它要在法律的基礎上建立起安全生產事故責任追究體制，即把政府部門、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在安全生產上的責任規定得十分明確，使有關的責任落實到最基層。同時對負有審查、審批、驗收職責的政府職能部門也明確了要對自己的行政行為負責，規定了法律責任。

在新中國建立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國才出台了這第一部全面規範安全生產的法律。一般來說，有全面規範的法律，會比沒有好些。不管它以後會否被各級行政官僚架空，視為具文，形同虛設，卻仍可能或多或少對有關人員產生威嚇的影響。但它難以有很大實際成效、不能夠從根本上扭轉上述的生產安全困局，則是可以預料的。

舉具體的一些條款來看。它規定的從業人員的許多權利，在以前的法例中已經列有，但卻「落實不下去」。他們以後也只能對本單位的安全生產工作提出批評、建議、檢舉、控告，卻無權力迫令企業一方接受；它雖規定從業人員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有權在發現緊急情況時停止工作和撤離工場，但他們如得不到企業管理方面同意而這樣做，卻有可能被後者「秋後算賬」，用其他藉口加以報復，以至開除。在實行市場經濟後，企業一方已被容許享有任

用和辭退職工的全權，而職工對此則完全處於無權無力地位。在失業日益嚴重的今天，許多職工寧願冒生命危險也會啞忍而照樣工作下去。工會（幾乎清一色是官方性質的）雖然被規定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法律、侵犯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提出建議，等等，但也同樣無權要求該單位加以接受。

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共所一直誇稱的「工人當家作主」，是「領導階級」的宣傳並沒有實現。如果工人階級真是在管理國家和生產各方面都有當家作主的決定權力，他們就可以直接、全面、有效地處理好安全生產的問題，而不會像現時那樣任由企業經營一方憑著資本與特權的結合來處理、決定。

同時，要落實工人管理和決定生產以至國家大事的權力，就必須廢除黨政官僚幹部所一直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和一黨專政，官員須由人民民主產生並隨時可以撤換，從而徹底消除生產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的根因。

以上的主張，在筆者兩年前刊出的該文內已有詳細闡述，上引《北京青年報》的7月4日社評，也或多或少表現出這些主張確實是客觀的迫切需要。

註釋：

- (1)、(3) 2002年7月4日《北京青年報》
- (2)、(4) 7月6日《中國青年報》。

2002年8月13日

（轉載） 遼陽工人領袖仍被關押

中國勞工觀察

遼陽公安局宣佈，以貪污罪名拘捕原遼陽鐵合金廠范一成，然而遼陽工人領袖仍被關押，政府並拒絕律師會見被捕工人領袖。

遼陽市鐵合金廠工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反對工廠領導貪污腐敗行為。從1999年開始，進行了長達四年多的抗爭行動。在2002年的3月，在中國人大政協會議召開之時，遼陽鐵合金廠的工人再次走上街頭，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關注勞工權益，示威一

度超過上萬人。

遼陽工人的示威行為引起了國際社會和中國政府的廣泛注意。遼陽市政府一方面拘捕了部份示威的工人代表，另一方面也解決了長期拖欠工人的養老金，醫療費，職工子女再就業等問題，並給與困難職工適當的生活補助。

然而遼陽工運領袖姚福信3月17日，龐慶祥、肖雲良和王兆明等人，在3月20日，被遼陽當局拘捕以

來，已經超過4個月，遼陽市法院仍然沒有對其進行審判，姚福信的家人已經請了律師，而遼陽市公安局不讓律師會見姚福信，並說明要請示遼寧省公安廳。這違反了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2002年6月25日，600多工人簽名要求遼陽政府釋放姚福信，龐慶祥、肖雲良和王兆明，並把這一簽名交給了遼陽市政府，在目前為止，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2002年7月26日，遼陽市電視臺宣佈了當局拘捕了被工人指責為搞垮遼陽鐵合金廠的廠長范一成。

據中國勞工觀察從國內得到的消息：遼陽市當局試圖把姚福信，肖雲良等人 and 中國民主黨事件進行挂勾，而予以重判。中國勞工觀察呼籲遼陽當局儘快釋放姚福信，龐慶祥、肖雲良和王兆明，希望當局不要強加給工人代表不存在的罪名。

中國勞工觀察（7月29日）

（轉載）

釋放楊建利

中國西部五省市民運界聯合呼籲

我們有必要重申這樣一個常識：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國家，而非一人、一姓、一黨、一小集團的國家。因此，任何國民或團體，都有為國家的免於崩潰、促進發展勞心勞力的權利和責任。

我們有必要重申另一個常識：一個國家，如果被一人、一姓、一黨、一小集團把持，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注定要走向衰敗、崩潰，它的災難和恐懼是巨大而普遍的。因此，任何國民或團體，都有為自己所屬國家的民主化的實現而不懈努力的權利和責任。

楊建利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實踐自己權利和責任的中國公民。

楊建利先生是一位優秀的留美中國學生，1989年國內各階層人民起來反對腐敗、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時候，他毅然回國參加了這場運動。大屠殺、大鎮壓中他被迫流亡海外，更加深入地投身到推動我們國家民主化轉化的運動中去。

楊建利先生深入地探索中國現代民主和人權實現的道路，努力倡導人權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原則，捍衛和平、理性地推動我國民主化實現的原則和尋求其方法。

他和友人們組建中國民主基金會，創辦憲政民主刊物《議報》，鼓勵國內朋友推動基層民主建設進程。

正因為這樣，他成為了中國大陸獨政當局的眼中釘，他被獨政當局列進黑名單，被非法地剝奪了回國

的權利和其他公民權利。

當他知道，由於獨政當局阻礙社會進步，阻礙人民自由和權利的實現已經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如果不和平、理性地推動我國民主化事業的進程將會給我們的人民和全人類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他毅然選擇了打破海內外民主力量被隔絕局面的闖關回國道路。他考察北方工潮，他努力與國內民運友人聯繫……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實踐自己作為一個中國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實現，在中國大陸獨政當局看來是極端恐懼、極端危險和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不顧全世界人民連綿不絕的正義呼聲，將楊先生非法拘押，拘押數月至今，以此顯示自己的頑固，以此恐嚇來掩藏自己的恐懼。

其實，楊建利先生和我們國內民運界的人們一樣，致力於國家的憲政民主建設，致力於國家免於崩潰的災難，致力於包括今天獨政當局成員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免於恐懼的實現。對於在危機累積面前束手無策的獨政當局，我們認為：恐怖只能來自於恐怖製造者本身。

及此非法拘押楊建利先生和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國大陸西部五省市50名公民聯名向獨政當局和國內人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

1、解除對楊建利先生的非法拘押，恢復楊建利先生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

2、停止政治迫害，釋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及宗教人士，實現政治、宗教和解；

3、推動憲政民主建設，保障全民利益，實現權力制衡。

我們同時表示，現代民主的中國的實現沒有必然的恐懼，民主中國的目標沒有實現，我們沒有畏懼。

簽名人

陝西：吳震、馬駿、林牧、張宗愛、趙常青、林小平、高凱、魏克君、程小保、師濤、顏均、陸中明、傅升、吳雙印、李智英、馬曉明

四川：陳衛、廖亦武、歐陽懿、陳明先、蒲勇、周志剛、朱易平、曾福洪、鄧輝

重慶：鄧煥武、王明、李運生、熊志力、張傑、閻家鑫、何兵

貴州：廖雙元、莫建剛、曾甯、孫光權、黃燕明、張重發、李家華、方家華、季風、陶玉平、全林志、吳郁、陳德富、熊晉仁、杜和平

廣西：李小龍、王治晶、薛振標

2002年6月26日

（轉載）籌辦全國聯署援救楊建利， 異議人士趙常青失蹤

中國人權

中國人權得到國內北京西安等多方異議人士通報，在全國各省市聯合170人署名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從7月3日晚便與朋友親屬失去聯繫而失蹤。

據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說，6月底西安警察在詢問張宗愛的時候曾向他表示，營救楊建利的全國性呼籲書，警方知道是趙常青一手操辦的。警察那時的話意裏，已經流露相當重視甚至要懲辦的意思。一些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反映，趙常青的失蹤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不懼以往的鎮壓而公然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害怕這股關心工人和營救異議人士的力量，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中重新崛起，因此要對為首的趙常青施加嚴厲打擊。國內多方異議人士同時呼籲國際媒體和輿論，關注趙常青的失蹤情況並進行救援，也要求中國政府制止中國警方採用非法的秘密失蹤手段。趙常青發起的170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行動，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法新社等許多重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道。公開信所

呼籲營救的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4月闖關回到中國瞭解工潮情況，4月26日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現年34歲的趙常青，原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6·4”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半年多。1997年趙常青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陝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同時趙常青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物件和範圍。結果趙常青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被認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3年。趙常青2001年出獄後還丟失了教師工作，依靠毫無保障的零散工作艱難度日。

中國人權對趙常青的情況十分關注，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對趙常青按照失蹤立案調查。如果趙常青確屬中國警方秘密逮捕，中國人權嚴正抗議這種人權迫害和非法行徑，並要求中國政府責成中國警方立即釋放趙常青，並賠償所造成的經濟和身心損害。

中國人權（2002年7月9日）

(轉載) 王炳章父母致江澤民信

王俊禎、王桂芳

尊敬的江主席：您好！

我們十分冒昧地寫信給您，是關於我的兒子王炳章失蹤一事。據美國和加拿大《世界日報》7月23日和25日報道的消息，傳聞我兒子王炳章於6月26日在中越邊境失蹤，並被中國政府拘捕。對此，我們深感震驚和焦慮萬分。

我們知道他的越南之行是私人性質的旅遊。不知為何遭中國公安機關拘捕。我們為他的人身安全感到焦慮。所以，我們懇求您的幫助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並儘快釋放我們的兒子王炳章。

對於您來講，這個請求可能是冒昧的。但是，我

們這樣做是萬般無奈的。我們已是83歲高齡風燭殘年的兩位老人。尊敬的江主席，我們想，您不會拒絕兩位可憐老人的請求的。

我們委託我們的女兒王梅為我們的聯繫人。她現居住在美國的西雅圖市。我們希望儘快得到他的消息，急切地盼望他會帶我們身邊。

此致：

敬禮！

王炳章的父親 王俊禎

王炳章的母親 王桂芳

2002年8月2日

(轉載) 岳武夫人致江澤民主席信

岳愛玲

尊敬的江主席：您好！

我叫岳愛玲，中國公民，現定居巴黎。據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和世界各大媒體報道，我的丈夫岳武於6月26日在中、越邊境失蹤，疑被中國政府拘押。對此，我和子女們都感到極為震驚。

我不知道這些消息是否準確。但自從6月26日以來，我就與我的丈夫失去任何聯繫。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能向祖國的親人，特別是向您求救。如果我的丈夫因觸犯法律被政府拘押，希望政府立即將羈押他的地址通知我，並泣請政府能確保他的人身安全及寬大處理，使我能從萬分焦慮中解放出來。如果政府

並未扣押他，萬望政府能與越南政府進行交涉，要求越南政府迅速查清我丈夫的下落，保障在越南旅行的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

尊敬的江主席，我的請求可能是十分冒昧的。但懇請主席理解一個失去丈夫的妻子的焦慮心情。我想，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主席，是不會拒絕一個可憐的中國女子急切的懇求的。

此致：

敬禮！

岳武的妻子 岳愛玲上

2002年8月2日

美帝國主義往何處去？

索尼特

柯林·鮑威爾出訪中東，只是擺一擺空手勢而已，他那玩世不恭的手法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彷彿美帝國主義對中東局勢是表示關切的，實際上仍然允許沙龍放手去繼續他的大屠殺政策。

其中道理是不難看出來的。對布殊及其百依百順的大伙伴貝理雅來說，這裡的主要問題就是所謂反恐戰爭——實際上，這場戰爭會進一步地加強美帝國主義在軍事、經濟、地緣政治以及思想領域內的統治權。

最近，布殊和貝理雅在布殊家鄉——得克薩斯州牧場舉行的會談，再明顯不過地證實了這一意圖。他們兩人為入侵伊拉克的戰爭計劃，最後確定了主要方針路線，一旦巴勒斯坦爆發出血洗事件，這場戰爭便開始了。血洗巴勒斯坦，自從九·一一恐怖事件以來，是美國政策的直接後果，這不僅給沙龍開了綠燈，去加強進攻巴勒斯坦，而且還在政治上為沙龍提供了所需的正義性和合理性。

如果說美國認為有必要可以動用任何軍事力量去反對本·拉登，正像他們自己所宣稱的是正確的話，則以色列可以動用任何軍事力量去反對巴解組織和阿拉法特也是正確的了。以色列代言人每天都在重複念著這個緊箍咒。

巴勒斯坦人的堅決反抗，阿拉伯國家對沙龍的赤裸裸殘暴作出的回應，非但沒有使英、美拋棄他們的路線，反之，布殊和貝理雅仍然繼續討論並完善他們的戰爭規劃，彷彿今天的巴勒斯坦並不存在著全面出動的戰爭。

他們站出來宣佈說要在伊拉克改變政權是必要的，並說明要引發一場必要的戰爭來實現這一目的。

有人告訴薩達姆說：伊拉克必須履行聯合國所有決議案，否則將面臨軍事襲擊。而此時此刻正是沙龍拒絕執行聯合國另一決議，即從巴勒斯坦領土上撤軍。

也還有人告訴伊拉克說，它必須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容許任何人檢查」這一條件基礎上，接受聯合國的武器檢查——條件必須經過認真選擇，因為有可能不會被接受。

為什麼布殊和貝理雅對入侵伊拉克如此深感興趣呢？首先一個理由是，這一地區的石油儲蓄量關係到美國的戰略利益，伊拉克的石油儲量是阿富汗過去和現在所未曾出現過的，正是為了這同一理由，美國向以色列提供大量資金，使其成為美國戰略利益的前沿

護隊。以色列是美國地區性帝國主義利益的絕對可信賴的幫兇，它不像阿拉伯資產階級政權所喜歡扮演那種角色——因為最近示威遊行的巨浪席捲阿拉伯世界所表明的那樣——阿拉伯資產階級政權還不得不同具有各不相同遠景和形勢的民族和人民作鬥爭。

第二個理由就是美國要在世界範圍內，發動一場規模更大的國際霸權主義運動。入侵伊拉克可使美國操縱大規模戰爭升級，而同時能提高它的區域性利益。

當然，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美國入侵伊拉克就是要拆散在入侵阿富汗時所已取得的聯盟，並使這個地區的形勢加深不穩定性。

布殊對此是有所準備的，只要他有貝理雅和新工黨肩並肩地與他站在一起——給他提供政治上支持和不列顛空軍戰略基地。貝理雅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也是有所準備的，他準備應對工黨議會小組內反對派的挑戰。

對布殊來說，優先考慮的是利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蘇聯和華沙條約國的崩潰而給他打開美帝國主義道路的機會。蘇聯等國的崩潰，是國內危機帶來的後果，西方國家袖手旁觀，卻使美國成為唯一的世界超級大國。

美國不只是唯一的帝國主義大國，而且以壓倒優勢作為統治一切的霸主出現在世界上，它擺脫了越南綜合症，這種綜合症曾使美國20年內不敢在國外採取軍事行動。今天美國達到的軍事統治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已經達到的要強大得多。

上世紀90年代的特點是：美國軍事實力上升到最高點，這個軍事大國是在里根的軍事組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說得更確切一點，九十年代已經看到了華盛頓能力不斷上升到足資利用它的軍事實力了。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時代標記便是1992年的海灣戰爭（在此期間，新的世界秩序從未實現過），以及1997年的炮轟塞爾維亞。這兩場戰爭都是在加強使用空軍力量以及美國軍事技術的日益尖端化、複雜化條件下進行的。

下個年度，美國軍事支出將增加480億美元，這就更進一步地推動了美國軍事實力。與此同時，布殊著手利用可以接受的核武器作為戰場上自由選擇。如有必要，布殊還可在緊急情況下，在伊拉克使用核武器。新一代武器是按照星際戰爭方案加以研製開發的，這就容許美國無需害怕報復便可使用新生代武器

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還表明美國經濟霸權主義的上升。這是美國長期擴張的結果，與此相適應，七十年代以來作為主要經濟對手的日本，則處於長時期的衰退之中。與此同時，人們還可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取得了成功，它標誌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一個新時期的飛速到來。

反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在歐洲採取的反擊形式是：以法國為首，協同其他歐陸國家舉行群眾性罷工運動，反對一攬子式緊縮政策。

但在南朝鮮、印度、墨西哥以及許多其他地方，反擊形式更加激進化，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直接反對全球化本身帶來的後果。國際資本的日益不穩定，已由東南亞經濟危機所證實了，並威脅到整個體制的穩定性。

如同我們所熟知的，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激發起反全球化運動的熱潮，每當全球化資本的國際組織召開會議討論他們的綱要時，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便出現了。但這種示威遊行的性質已遠遠超過了它原來的意義。其根源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升級了，這種不平等直接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存在於民族國家相互之間，存在於民族國家之內——同樣存在於第三世界群眾運動之中。

九·一一事變之後，布殊的「反恐」戰爭力圖要扭轉日益增長的反全球化勢力，並使這股勢力朝著相反方向轉變。「反恐」戰爭還要進一步地改變世界各種勢力的平衡以有利於美國，並力圖利用美國的軍事實力來加強美國地緣政治的利益，使其搖搖欲墜的政治制度會繼續支撐下去。

這個暴跳如雷的超級大國究竟以何種姿態出現呢？控制著布殊政府和右翼共和黨人的，是沒有人挑戰的軍事機器，而美國的政治局勢恰好容許他們以空前未有規模，空前未有方式去利用這架軍事機器。

越南式綜合症早已肅清了，目前美國軍隊已在100個國家裡有軍事行動，而且要求擴大到更多國家中去。特種部隊和情報部門已在大規模地擴充起來。

這架軍事機器運作起來的後果，不僅只在阿富汗屠殺了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策動了反巴勒斯坦戰爭，而且還在車臣採取更大規模鎮壓措施，並將美國軍隊引進一系列國家中去，而這些國家在此之前，從不可能有軍隊部署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世界一系列國家裡，對民權和人權的大規模進攻。總之，從九·一一事件後，世界已變得更加危險的了——特別當你是一個穆斯林教徒，一個少數民族份子，或一個為爭取民族、民主權

利而奮鬥的人的時候，世界對你來說就更加可怕了。

這樣看來，在紐約世貿中心姐妹大樓受到襲擊後7個月以來，世界力量平衡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事實是十分清楚的：越來越多的人死於美軍以及得到美軍支持和鼓勵的那些武裝份子手中，這種局面有可能繼續下去，而且還會不斷地升級——特別當伊拉克一旦受到入侵時，情況更加如此。

世界力量對比沿著有利於美帝國主義的方向轉變，這同樣是無可置疑。但美帝國主義能否保持穩定，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阿根廷，我們已經看到群眾運動接連不斷地推翻了三屆政府，令人難以置信的巴勒斯坦人的鬥爭，不只是表明他們有權要保護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且也表明他們是對布殊和貝理雅戰爭行動的直接回應，儘管這場戰爭行動是由沙龍執行的。

此時此刻，巴勒斯坦人是站在第一線的反戰鬥士。他們出色的反擊，證明有進攻必有反擊……而反擊必然加深了不穩定性。不管處在那一個階段上，戰爭販子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以色列坦克殘酷摧毀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慘象，迫使人民群眾從埃及到印度尼西亞，紛紛走上街頭。

接著，反戰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出現了。布魯塞爾「12月示威遊行」的規模是很大的：工會策動的示威遊行隊伍多達8萬人，而第二天由反資本主義左派發動的示威遊行的人數，也有3萬人。

巴西阿雷格里港今年的遊行隊伍是去年的兩倍，約有8萬人參加。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塞羅那的示威遊行人數高達50萬，遠遠地超出了組織者的預料之外。這再一次活生生地證明了：群眾運動不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還可以向前跨出新的一步，使鬥爭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工會鬥爭的層面上，伯利斯科尼鎮壓意大利工會運動的措施——這措施得到貝理雅的支持，而貝理雅則主張在全歐洲推行不列顛式的勞工關係——這措施卻激發起300萬人的總動員，在上個月走上羅馬街頭……這是戰後以來，意大利工會規模最大的總動員了。

這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回擊，會清除掉美帝國主義大規模的野蠻進攻，也不意味著會驅使美帝國主義採取守勢。但這確然意味著回擊是富有現實意義的，這裡確實存在著回擊。

今天，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儘管強大，但我們未必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美國軍力復興期。這不僅因為美國軍力的經濟基礎很不穩定，而且還存在著反對這種軍力的對抗性因素。美國軍力的使用是無法預卜的，也有可能變為無法控制。

與此同時，世界在不斷變化著。美國面臨著來自歐盟框架內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挑戰。日本以及太平洋周邊的經濟實體，將會以新的、更具嚴重性的挑戰面貌而出現，中國則是一個迅速上升的經濟大國，有大量人口和潛在的資源。

目前，布殊政府對此作出的回應，便是利用其軍事實力，創造地緣政治條件去對抗歐盟、日本、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戰爭行動確是代表新自由主義全球攻勢的軍方一翼。

就短期或中期而言，這也許是有效的，但要長期解決美資本主義問題，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左派，目前有著可喜的機會，同時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反伊拉克戰爭定將創造出新的、規模更大的反戰運動，歐洲定將出現激進主義，並在意大利工人階級和激進運動中明顯地體現出來。

拿不勒斯10月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有助於把這些經驗普遍地推廣開來。不列顛王國的工會鬥爭緊隨著強有力的反戰和反全球化運動，現已有了重大的發展。我們左派必須確保把所有這一切發展同歐洲以及國際上的重大運動相互聯繫起來。

（黃申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2年5月號）

關於「反恐戰爭」的公開聲明

越戰退伍軍人全國反戰協會

九·一一恐怖主義分子對紐約、華盛頓和賓夕法尼亞州的襲擊，使世界大部份地區受到震驚，蒙上了陰影。越戰退伍軍人全國反戰協會仍繼續譴責這次襲擊是犯罪行爲，繼續呼籲要對真正負責的恐怖分子予以嚴厲懲罰和逮捕。

正當我們爲九·一一事件中的犧牲者深表悲痛的時候，我們也同樣爲阿富汗的、美國的軍人和平民的死難者表示哀悼。

最近幾個月中，不論什麼人，只要被定性爲「恐怖分子」，那就成了新的妖魔鬼怪了。但我們必須懂得，誰被稱爲恐怖主義分子，誰被稱爲保衛自由戰士，這都取決於是誰給你下這個稱號。1776年參加獨立戰爭的、我們自己原先民兵的戰士們，肯定會被英國人打上恐怖主義分子的烙印。

九·一一事件後，我們在軍事上的回應，已在阿富汗引起的平民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劫機事件在我們國家引起的死亡人數。這就說明了美國也正在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我們國家領導人力圖把恐怖主義推向其他國家去。

對包括「邪惡軸心在內的」、這種未經宣佈的戰爭範圍的擴大，實質上就是放鬆了對使用核武器的標準，以使用來反對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北朝鮮、中國和俄羅斯。我們強烈反對任何不受限制、任意決定戰爭學說，反對無緣無故地使用美國的軍事實權。

我們政府中有人把「反恐戰爭」的短期成果自詡

爲勝利。但我們必須注意到，20年來以色列一直從事於反恐怖主義的所謂勝利的軍事行動，但沒有一次勝利能使射擊或轟炸停止下來，或者能使以色列成爲一個安全的地方。與此相反，軍事上作出的回應，已引起破壞活動的不斷增加。

我們認爲，把俘虜作爲軍事基地上的拘留者來處理，是開創了一個最壞的先例，也是最糟的政策表現。我們美國公民或早或遲地會遭受這種政策後果的折磨。被拘留者應當像普通罪犯一樣，要向他們提起公訴，進行審判，給予戰俘待遇，或者將他們釋放，所有這些都是很清楚地寫進聯合國憲章、日內瓦會議協定、其他人權法則，包括我們自己的人權法則在內。我們也同樣反對用任何苛刑拷打被拘留者，我們要求給他們以適當的居住條件。

在國內，我們要求對每一個市民權利要採取同等保護。我們強烈地譴責這一事實：即對數千美國穆斯林，未經起訴、審判甚至非法地將他們拘禁起來或單獨關禁。這是在「反恐戰爭」的國內方面，我們必須反對這樣的行爲以及由此得出的必然的種族歧視。

最後，我們「越戰退伍軍人反戰全國協會」的成員們，號召所有支持和平和社會正義的人們，按照自己原則行動起來，並與社區內其他人士團結一致，反對最近發動起來的「反恐戰爭」，同時還要反對借口公共安全，實際上就是國內的恐怖主義。

2002年3月

（蕭明譯）

「菲律賓反恐戰爭」質疑

蒂松

有600名以上的美國特種部隊駐紮在菲律賓的中、南部，特別是棉蘭佬島三寶顏附近的巴西蘭島上。很明顯，美國這支部隊是為了培訓菲律賓的武裝力量去同阿布沙耶夫作戰，菲律賓政府稱這是當地的暴徒集團，與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有關。布殊政府把這種最新的軍隊部署描述為在阿富汗取得戰役勝利之後反恐戰爭的第二階段。近來，布殊政府又說這是軍事干預也門的樣版，因為美國武裝力量只需對當地軍隊加以培訓或提供技術援助，而無需捲入到實際戰鬥中去。

分析家們對局勢的進一步分析，揭示出布殊政府和菲律賓阿羅約政府的真正政治動機，決不是單純地為了同阿布沙耶夫作戰。眾所周知，這已不是第一次美國軍事力量在棉蘭佬區與穆斯林菲律賓人或摩洛哥族作戰，美國在棉蘭佬區為反對摩洛哥族建立摩洛哥省，已打了一場持續很久的綏靖戰。美國使用一級兵力、欺騙手法以及分而治之戰略去反對設備極差的敵手，數以千計摩洛哥族遭到集體屠殺，一大批摩洛哥人被遷徙出去了。

阿布沙耶夫為什麼會引起這個超級大國的興趣呢？軍方認為阿布沙耶夫只不過是一群土匪，他們進行搶劫、拐騙或其他形式的海盜行為。棉蘭佬地區，像許多東南亞地區一樣，這種「海盜」行為已有很長歷史，可以追溯到16-17世紀西班牙殖民時期。而摩洛哥族也並不相信阿布沙耶夫，也沒有給予支持，因此在菲律賓軍事打擊下，人數已從三年前的600人下降到目前的60人了。實際上，菲律賓這支軍隊，是作為打擊起義的摩洛哥族伊斯蘭解放陣線建立起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菲律賓部隊掃蕩了阿布沙耶夫的整個領導層，約有35名阿布沙耶夫成員及他們的人質，被政府軍包圍在巴西蘭島拉米坦市的一家醫院和一所教堂內，經過激烈戰鬥，至少有12名士兵和平民被殺害。

後來，阿布沙耶夫領導利用政府軍內部危機，帶著大多數人質，從醫院後門逃跑了，人質中包括有加利福尼亞州的素貝洛和堪薩斯州的伯納奴。據報道，當阿布沙耶夫叛軍撤退時，在戰鬥間隙期釋放了百萬富翁建築業巨頭羅梅亞等三人，羅梅亞為此支付贖金50萬美元。曾經做過人質的拉來坦市教會牧師西里洛證實：阿布沙耶夫叛軍、政府軍官員與巴西蘭首長之間瓜分了這批贖金。當地人民對此並不懷疑，並且進

一步證實了這三者之間的相互勾結。

阿羅約政府掌權之後，本應對此事件進行調查，但軍方壓住了，因為阿羅約上台是得到軍方支持的。阿羅約總統對此深表感激。根據菲律賓現有實力，是完全有能力消滅阿布沙耶夫集團，但這個集團的存在，有利於菲律賓的政治和軍事建設，終於成了阿羅約政府和軍方的搖錢樹。阿羅約總統給美國提供軍事基地，接受布殊政府一億美元新的軍事援助。

布殊政府參加巴西蘭島上戰爭有其自己動機。它可以向國際社會表明，反恐戰爭已經擴大了，並在新的陣地上取得勝利。然而，戰爭擴大的危機在於：可觸發起同鄰近的摩洛哥伊斯蘭解放陣線的衝突。國際人權組織已經指控美國侵害人權，把反摩洛哥族鬥爭升級了。

與菲律賓軍方採取聯合軍事行動會給美國以機會，加強它在東南亞的防禦作用。並允許美國軍隊能在阿拉伯海灣和美國西海岸之間進行有效的部署。

美國武裝力量在菲律賓出現時，曾遭到民族主義集團的反抗。前參議員坦納達提出警告說：菲律賓政府關於邀請美國部隊的理由，前後說法不一貫，缺乏透明度，到底美國部隊是來參加聯合演習，或直接參加戰鬥呢？美軍直接參加戰鬥是違反憲法的，也是違反防禦條約的規定的。

東南亞國家不少分析家向布殊政府提出質疑，因為布殊政府曾聲稱，該地區的恐怖主義組織是與「基地」組織有直接聯繫的。分析家認為東南亞國家的人民運動正在不斷壯大，有的是伊斯蘭精神鼓舞下，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部份是民族集團要求自決權，如印度尼西亞，其中大多數都是貧困民族的起義運動。所有這些都不能稱為國際恐怖主義網絡的一部份。然而該地區的一些政府利用反恐戰爭作為借口，事實上是為了鎮壓他們的政治反對派。

概括起來一句話，要摧毀阿布沙耶夫海盜集團，菲律賓並不需要美國軍事勢力的直接參與。他們來到菲律賓只是為阿羅約政府和軍方所用，進一步地實行他們的政治目標。布殊總統也同樣利用阿布沙耶夫集團擴大它在東南亞的反恐戰爭以確保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佔領。

（蕭明節譯自《退伍軍人》第32卷第1期）

美軍車壓死韓少女事件與駐韓美軍地位協定

趙京譯

6月13日，在韓國全土狂吹世界盃足球賽的氣氛中，駐韓美軍第二師第四十四工兵連所屬的運輸用裝甲車在道路上壓死兩個14歲的中學生少女。6天之後，第二師司令部公佈了一個簡報，稱「事故發生在與韓國軍隊進行戰術評定的共同訓練中。當時車輛時速為8-11公里，駕駛員沒有注意到那兩個中學生。」

這是一個遲早會發生的事件。事發地點的單行車道最寬處也只有3.3米，黃線外的人行道只有30-40公分。附近住民證實：「大型車輛通行時，人行道上有人時通常要開車到車道中線外。」「有好幾次爲了避開車輛，只好跳到道路邊的田地裡。」據加油站的店員介紹，美軍車輛一般以時速五十公里迅速「疾走」，而造成事故的裝甲車寬達3.65米，超過車道寬度，怎能不出事？

美軍對於住民的證詞否認不顧，其公佈的簡報明顯違背事實。爲此，民主律師協會進行了獨自調查，於7月3日發表結果，提出許多疑問。一、第二師6月19日公佈調查結果時，說韓國警察、韓國憲兵隊也參與了調查，但只有美軍醫生被通知參與調查；二、裝甲車時速16公里的剎車距離不會超過一米，但從兩個少女被壓死的現場看，剎車距離遠大於一米，裝甲車至少時速在30-40公里以上；三、事故發生時，是否正遇上對面開來的別的裝甲車？因爲在造成事故的裝甲車一米遠處，還停有另一輛裝甲車。

更讓韓國民眾激憤的是所謂駐韓美軍地位協定（注*）。按照此協定，公務時的美軍士兵犯罪事件

的裁判權由美軍行使。駐朝美軍司令7月4日發表聲明道歉，並於7月5日逮捕了肇事的兩名士兵，表示盡最大努力與韓國的法務部合作。不過，這兩名士兵以「感受到威脅」爲名拒絕到漢城地方法院受審。

1967年地位協定生效以前，不存在關於美軍犯罪的統計。從67年到98年之間，有50,082件美軍犯罪事件，涉及56,904名美軍人員。協定第二十二條規定駐美軍的犯罪刑事管轄權廣泛地屬於美軍當局。只是在2000年末才改訂第二十二條的一部份，把殺人、強姦、拐騙、麻藥等重大犯罪的管轄權「讓渡」給韓國當局。實際上，70%以上的常見犯罪（盜竊、行兇、交通事故等）仍然由美軍管轄，而所謂「公務中」（只要美軍出具證明即可以認定爲「公務中」）的犯罪，則依然維持不變由美軍管轄。正是這個不平等的出賣韓國主權的條約，爲美軍從制度上設計了無限地帶，阻礙了對美軍犯罪的處罰。美軍從來沒有公正地審判過自己的犯罪人員。

這一次，韓國民眾動員起來，參加了四次「普遍國民大會」，在市政府和第二師司令部前示威，要求美軍引渡犯罪士兵，要求修改地位協定，要求美軍撤出朝鮮半島。

（趙京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7月29日號轉載的韓國報刊。）

注*：參照《十月評論》2000年第4期的簡介。

太極旗是朝鮮民族的象徵嗎？

趙京譯

在世界盃足球賽期間，本來與民眾生活無關的太極旗突然飄揚在韓國的大街小巷，成爲朝鮮民族的象

徵被崇拜起來。

120年前，朝鮮因為雲揚號事件受到日本的侮辱，被迫開放門戶。當時的朝鮮派往日本的使臣金弘集一行從黃遵憲的《朝鮮策略》一書中受到啓發開始設想「朝鮮國旗」。黃遵憲勸告朝鮮人就用清朝的龍旗，向世界宣示朝鮮是大清帝國的屬國。朝鮮政府詢問清朝該用哪種顏色，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回答用清朝的四角龍旗即可，但朝鮮「國旗」的龍爪只能有四個，以示諸侯國與天子國（五隻龍爪）的不同。朝鮮政府沒有採納。

太極旗被廣泛認知為另一個駐日本使臣朴庸和（音譯）在其一行到達神戶時首次飄揚在他們的住屋上。那麼，這第一面「朝鮮國旗」是如何誕生的呢？

從記錄馬建忠（清朝派駐朝鮮使臣、主導簽署朝鮮與美國通商條約）與金洪吉（音譯）對話的《清國問答》上知道，正是馬建忠提議在白布上畫上太極並配置八卦作為朝鮮的國旗。朝鮮在壬午軍亂後被迫與日本簽署濟物浦條約，朴庸和作為使臣被派往日本去謝罪，在開往神戶的日本籍「明治丸」一船中設計朝鮮國旗時匆忙決定用馬建忠的圖案。明治丸船長是英

國人詹姆斯，當時的英國駐朝鮮領事伊斯坦也同行，他們覺得八卦太複雜，建議只留四卦，並旋轉45度，更顯美觀。太極旗就是這樣誕生的。

朝鮮文化中本沒有《周易》、八卦的傳統，怎麼把太極旗朝鮮化呢？1957年「國旗保養會」著的《國旗解說》宣稱自從檀君聖祖以來朝鮮就把太極八卦作為國旗利用。1995年大韓民國國旗宣揚會在舉辦太極旗變遷史展覽會時宣稱1392年的梵鐘上就刻有太極旗，但誰也未見過這個梵鐘。李承晚政權下的文教部長等特別從埃及、羅馬、希臘、拜占庭等古代遺物中找出與太極、八卦有點類似的地方，說明太極不是中國的特產，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宇宙觀。

當然，除了韓國政府的曲解、利用外，在抗日獨立運動以及光州事件這樣的民眾運動中，太極旗也確實被民眾作為正義的象徵飄揚。朝鮮統一後還會用太極旗作為國旗嗎？這要看朝鮮將如何實現統一了。

（趙京編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7月15號轉載的韓國報刊）

韓元彩著《脫北者》介紹

瀧山五郎

此書是作者到1998年8月為止三次從北朝鮮逃往中國的記錄，執筆於作者在中國東北逃亡期間，並交由日本的「北朝鮮難民救援基金」組織和中國的基督教徒，由李山河譯為日文，在晚聲社發行。2000年9月，韓元彩再次被中國的警察逮捕並押送回北朝鮮，三天以內被拷問至死。韓的妻子申錦鈴也被拷問至殘，下落不明；他們的三個兒女後來成功逃到韓國。

韓元彩在朝鮮人民軍直屬的造紙廠工作，也為國家安全部門工作過。但是，其父親在朝鮮戰爭後曾南逃，其伯父被國家安全部處刑，所以受到株連，最終決定全家出逃。

此書詳細揭露北朝鮮的監獄裡無法、無人權的淒慘景象。除了遭受肆意拷打外，因為北朝鮮的經濟困境，囚人們六天只能吃五頓玉米粥，立即營養失調或

染上疾病。實際上，連人民軍士兵和警察也飢不擇食，變成無法無天的強盜集團。據93年以來在中朝邊境採訪的日本記者石丸次郎介紹，有一次他從中國方面爬上白頭山頂，被兩個朝鮮士兵發現，當場搶過他的所有食物吞進口中。

此書也揭露了作者在中國被拘留期間遭到拷打的十八天。難道翻越邊界就沒有法律、人權而淪成奴隸了嗎？朝鮮的狀況事態緊急，首先，國際社會應該救援那些逃出北朝鮮在中國潛伏的難民（據石丸估計，在5萬至10萬人之間）；其次，應該援助仍然在北朝鮮境內的飢餓的民眾。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7月22日號）

全球化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

阿伯拉罕、納賽爾博士

在過去十年間，反全球化運動得到愈來愈多的群眾的支持，這是不容置疑的。群眾的支持常常是公開地、突然地爆發開來，最著名的如1999年在西雅圖，同樣令人矚目的如在華盛頓、熱那亞、洛杉磯等地都曾發生過。

反全球化運動是一個反對跨國公司全球政策的原則性鬥爭。跨國公司的全球政策只會增加國內和國際間的社會矛盾。

全球化政策破壞生態環境和造成貧困、無知，造成文化信仰矛盾激化。

全球化是訊息通訊技術革命的產物，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都有影響。全球化過程就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促進跨國公司的世界統治。西方先進國家物質的和意識的動機一直是按照帝國主義的意圖，把西方社會和模式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

跨國公司和帝國主義的聯合統治繼承了美國壓制世界人民的多樣性，硬把其他民族和社會的特點納入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社會之中。這種霸權政策使受害國家遭到嚴重的破壞，而矛盾衝突會把世界投入到戰爭和自我毀滅之中。

跨國公司的商業利益同西方強國的帝國主義野心是相連和互相支持的，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在國際關係中的大小和強弱國家的糾紛中可以得到證實，我們可以從關貿協定中，或者從美國指使的許多戰爭中，從各種國際會議和生態環境會議、反種族歧視會議中，從美國在聯合國中進行的種族阻撓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從社會、道德和文化方面抵制全球化是十分迫切的。這種抵制並非拒絕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能夠而且應該為所有國家、民族、社會階層和階級服務。科學技術不應當只屬於某一國家，某種文化，或者某個公司集團。它們掌握科學技術只在於損害千百萬人民利益來謀取一己之利。

巴勒斯坦悲劇與以色列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英國根據貝爾福宣言（註）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在英國託管期間，英國資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給予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末，英國經過殘酷鎮壓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之後，為猶太復國主義接管巴勒斯坦作好了準備。

二戰後，美國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領頭羊，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計劃便由美國來執行。1948年5月，以色列國成立。19年後，以色列襲擊阿拉伯國家，佔領了全部巴勒斯坦地區、埃及的西奈半島和敘利亞的高蘭高地。

戰爭的後果是：超過百萬的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流落到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約旦、敘利亞、黎巴嫩）成了難民，在難民營中生活。今日的難民已達四百萬人。以色列違反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協議，拒絕這些難民有返回自己家園的權利。

這些殖民主義的行徑是以保證猶太人的幸福為借口而採取的。而帝國主義者的行動則是把這一地區作為橋樑以維護世界資本主義在中東的利益。

在這個地區建立一個以色列國家，這是帝國主義在這個地區的計劃一部份。以猶太人的悲慘命運為理由，只不過是使帝國主義的計劃合法化。這種做法，使大多數猶太人也成為帝國主義計劃的受害者。猶太人的利益並不在於反對阿拉伯國家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猶太人在歐洲的悲慘遭遇不能為帝國主義者使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傷害的殖民野心辯護。

以色列政府成了帝國主義在這地區的邊界警察，它要執行三種任務，即：控制阿拉伯國家的資源，特別是石油；作為反對阿拉伯國家發生的任何革命運動的堡壘；對付當時蘇聯所代表的所謂「共產主義」在中東的發展。

巴勒斯坦的悲劇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政策引起的。帝國主義支持以色列進行侵略。巴勒斯坦是受

害者。以色列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猶太復國主義這個概念結合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把以色列視為猶太人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又把以色列看成是西方文化的體現。作為前者，它永遠反對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作為後者，它「強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它所幹的就是築起保衛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反對所謂「野蠻的東方」和「阿拉伯恐怖主義」的一道防線。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給以色列予政治的物質的支持，正是基於它們加強對全世界統治的一種戰略。

以色列這個反面角色，並不限於佔領巴勒斯坦地區和拒絕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而且，以色列作為帝國主義在這個地區的先鋒，在全球化進程中，以其行為和政策表現出一副可憎可恨的面孔。這表現在以色列不斷地對阿拉伯國家進行侵略，和它同世界上血腥的獨裁和種族歧視的制度，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拉丁美洲法西斯獨裁政權及非洲的軍閥們的關係上。

以色列與帝國主義的聯盟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於感情和宗教的動機，亦非猶太人在歐洲的悲劇命運所引起。相反，這個聯盟的利益在於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保衛美國的全球政策，把中東各國置於西方政治和軍事統治之下。

否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是種族主義的表現

通過以色列進行種族清洗、有計劃的隔離、違反基本民法和人權的殖民計劃，從歷史上抹煞巴勒斯坦人，進而達到否定現實的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殖民化的歷史植根於宗教神話，認為對巴勒斯坦志願的侵略和佔領是正當的，同時也否認了40、50年代對巴勒斯坦地區進行連續不斷的種族清洗的歷史事實。

當前，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在政治上軍事上對以色列的佔領進行的抵抗都被說成是「恐怖」，必須用各種方法予以制止。只有那些否認巴勒斯坦人存在的合法性的人，才有資格獲得人權。

西方的傳媒都把以色列發動侵略戰爭和實行大屠殺說成是「民主以色列」自我防衛的權利，而把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視為不懂得民主的人，以色列則是文明和民主的樣板，有權作出判決和強迫別人服從它的意志。與此同時，西方傳媒卻把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描繪成復仇和憎恨的化身，醜化阿拉伯人的宗教

和文化，從而為「文化的對抗」創造了條件。

總的說來，以色列否認巴勒斯坦人是用全世界媒體對阿拉伯人的歪曲宣傳來包裝的。一則否認對方的特殊性，否認對方的人權，否認他們的文化特點，以至否認他們的存在；二則把以色列作為優秀的政治實體，有權利把別國置於受審的地位；這兩方面都體現了種族主義的嚴重程度。

和平進程與全球化

以色列憑著美國支持的軍事實力，把阿拉伯國家視為原始的世界，它對和平的觀點是：它有權規定實現和平的條件，包括和平的範圍，也包括巴勒斯坦人享有的權利。這個和平範圍包括如下五個「不准」，即不准巴勒斯坦人有回歸故里的權利，不准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享有歷史的和政治的權利；不准巴勒斯坦人遷移居住地；不准建立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

按照這種和平觀點，以色列採取限制巴勒斯坦運動，流放、暗殺、拘留、圍困、毀壞房舍和莊稼，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惡化。以色列不謀求和平，而是要屈服。

中東的和平進程開始於90年代初的馬德里會議。這是美以聯盟構架的裝飾品。由於蘇聯的瓦解和海灣戰爭的結果，在這一和平進程中，美國夢想把前蘇聯中東地區作為「新世界秩序」而與以色列所希望的「新中東」相配合。

馬德里會議之後接著又召開了一連串經濟會議，如在卡薩布蘭卡，多哈，阿曼和卡洛等地召開的會議，希圖重建中東和北非的經濟，給予這一地區的已完全陷於危機的國家一次最後的推動，使它們納入國際市場的自由經濟之中。這些會議的目的在於按照美國和以色列政治和經濟利益，來結束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及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這些會議作出決定：以色列政府政治上贊同不強迫以色列人接受巴勒斯坦的任何要求，同時亦不強迫阿拉伯國家社會經濟自由化。實際上，這一和平進程最主要的標誌是禁止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直接或間接的抵制。

巴勒斯坦領導人被迫接受的奧斯陸和平程序是使中東、中亞、南亞和遠東的相鄰地區對以色列開放，使巴勒斯坦人民成為美以領導和自由貿易區的廉價勞動力。巴勒斯坦拒絕這一和平進程。

巴勒斯坦建議和平要建立在聯合國決議的基礎上。聯合國的決議要求以色列撤退到1967年6月4日的邊界去，並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巴勒斯坦與反全球化運動

在中東，全球化進程中引起的矛盾，表現最為激烈。這裡存在著激進的伊斯蘭文化和宗教的激烈衝突、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和所有阿拉伯國家不斷增長的普遍不滿。

巴勒斯坦人民悲痛地單獨面對政治領袖被謀殺，房屋被拆毀，田地被毀壞，基礎設施被破壞，但英勇抵抗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巴勒斯坦愛國力量仍然是一個有著巨大吸引力的中心。

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和歐洲的調解人的可悲努力

得到的是痛苦的嘲弄。因為他們的企圖使巴勒斯坦人民接受這樣的決定，即否認自己的國家主權和獨立。

反全球化運動不只是希望巴勒斯坦人的鬥爭取得勝利，而且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中承擔責任，幫助它取得勝利。反全球化運動有責任在全世界舉起保衛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自由和獨立的旗幟。

（蔚然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3月號）

按：納賽爾是健康工作委員會工會副主管；阿伯拉罕是選擇信息中心的成員之一。

〔註〕貝爾福宣言是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宣佈的關於成立以色列國的宣言。

阿拉法特：其人其事

阿拉法特被視為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領導人達30年之久。以色列咒罵他是魔鬼化身的恐怖主義者。美國有時又歡迎他到白宮去。而傳媒則把他視為和平使者，向他歡呼。

阿拉法特是什麼人？他所幹的真正代表什麼？

阿拉法特的故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面鏡子。他生於1929年巴勒斯坦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像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樣，他的幼年是在英國統治下的耶路撒冷度過。

長期以來，在巴勒斯坦這個地方，居住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祇是在猶太復國主義者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才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

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地有意使巴勒斯坦人失去工作，並把他們趕出自己的家園。

阿拉法特在青少年時期便參加在埃及偷運武器給巴勒斯坦人反抗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圖謀。

1947年，聯合國計劃把55%的巴勒斯坦土地劃分給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移民。這些移民祇佔總人口的30%。但這並不能滿足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以色列

列的恐怖集團採取恐嚇手段把千千萬萬巴勒斯坦人趕出家門。許多人逃到約旦河西岸，為約旦所掠劫；逃到加沙地帶則受埃及的統治。

以色列國在1948年成立，擁有巴勒斯坦地區的76%的土地。而巴勒斯坦人則自此成了難民。

游擊隊抵抗運動

阿拉法特同一群巴勒斯坦學生和商人在1959年創立了法塔赫（即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簡稱）。該組織的目的是解放整個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民主的不分宗教的國家」。法塔赫從阿爾及利亞、中國、古巴和越南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中受到啟發，採取游擊戰進行反對以色列的鬥爭。

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打敗了敘利亞、約旦和埃及的軍隊，中東局勢由此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這次戰爭中，以色列攫取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這些地方自此成了以色列的佔領區。

1968年，一隊法塔赫的主要成員在約旦卡瑪拉

的戰鬥中打敗以色列，迫使其撤退。這使法塔赫在一夜之間成了英雄。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紛紛加入到法塔赫運動中來。

由於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法塔赫取得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控制權。巴解組織是在早幾年前由阿拉伯各政府建立起來的組織。法塔赫是其中的組成部份。

巴解組織的基地是在約旦，約旦70%的居民是巴勒斯坦人。約旦統治者哈桑國王很擔心權力落到巴解組織手中，在1970年9月對巴勒斯坦發動一次全力以赴的攻擊，殺死了好幾千巴勒斯坦人。這就是著名的「黑色九月」。

巴解組織從這次失敗中醒悟過來，便從約旦轉移到黎巴嫩新基地來。但已經被削弱了的巴解組織現在祇好依靠這個或那個阿拉伯國家政權，而不再對它們擺出任何挑戰的姿態；不再追求整個巴勒斯坦的解放，而祇是同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美國去討論建立一個「小國家」的問題。

1982年，當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沙龍帶領軍隊入侵黎巴嫩，在沙帕拉和薩梯拉難民營殺害2000名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和他的部隊決定離開黎巴嫩，踏上流亡突尼斯的旅途。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熱度也就降到了最低點。

但在佔領區內發生的事件卻把鬥爭又推回到國際政治的中心來。

起義運動

以色列在佔領區殘暴地壓迫巴勒斯坦人。對此，抵抗運動在1987年末忿然舉行了第一次起義，或叫「Intifata」。全世界都看到了巴勒斯坦的青年，用石塊襲擊用美國最新武器武裝起來的以色列士兵的圖片。新一代的積極份子就這樣在整個佔領區出現了。

起義運動者最終迫使以色列和美國同巴解組織進行談判。在1993年，阿拉法特簽署了奧斯陸「和平協議」。

這個協議承諾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一個友好國家。評論家們把這個協議看成是巴勒斯坦人為建立自己的家園和中東危機獲得解決的令人滿意的結果。

希望破滅了

阿拉法特同以色列領導人西蒙·佩雷斯和爾扎克·拉賓一同獲得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阿拉法特回到加沙地帶，受到大批歡樂的群眾歡迎。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也就在這一年成立。但，大多數群眾的希望是破滅了。奧斯陸「和平協議」是加強，而不是結束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統治。這個協議祇允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控制約旦河西岸土地的17%，和加沙地帶的60%。協議的區域劃分也沒搞成。以色列仍然控制著地區的各條通道。以色列在佔領區的種種決定依然保留著。500萬巴勒斯坦難民沒有一個能夠回到他們在以色列的合法的家中。這就是經過長期鬥爭，而大多數巴勒斯坦人想要但沒有得到的結果。為此，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人當中喪失了大部份的聲譽。

作為協議的一個結果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雖然允許人民有些少的民主，但它的3萬名警察對任何一個批評阿拉法特的人，唯一的就鎮壓。在阿拉法特的統治下，祇有少數人富起來了，而大多數人仍然在難民營中受苦。

當和平陷於絕境，哈馬斯在群眾中的聲望便升起來，而阿拉法特則失去他的基礎。

現實的情況是：要求反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困，普通老百姓的情況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變，這些迫使阿拉法特在2000年拒絕了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提出的新協議。這樣，在2000年9月，當沙龍挑釁性地去訪問在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最神聖的阿克薩清真寺，巴勒斯坦人民爆發了新的起義之時，阿拉法特支持起義，這使他得以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以色列攻擊阿拉法特，使他重獲巴勒斯坦人的某些信任。但這並不表明阿拉法特的政治生命還沒有完結。

在這位反對以色列的英雄領導人的肖像旁邊，將來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肖像。

阿拉法特在群眾要求進行根本改革的願望和阿拉伯統治者與西方國家的壓力之間，將會再次搞調和。（蔚然摘譯自2002年4月26日《社會主義工人報》）

俄國工人接管工廠的趨勢

布茲加林

俄國工人運動的近況，對政治科學家和社會學家是個謎。一方面，從俄羅斯大力推行市場改革以來，工人的實質工資下降了一半有多，而且拖欠工資；過去十年來，從全面就業滑落到12%失業率；企業無法提供工人在蘇聯時代享有的社會福利，而藍領工人和體力工人的地位也處在社會低位。儘管這樣，在另一方面，工人卻沒有顯著的勞工運動和工會運動作出回應。尤有甚者，經過1995-97年一輪工業行動後，工人的罷工次數更有下降。據官方記載顯示，這些年間，縱使出現罷工，也主要是來自教師追討欠薪。在市場改革8年來，勞工運動殊不成氣候。人們記憶猶新，在1989-91年，俄國全國受到礦工大罷工的震撼，工人在一夜之間，從沉默中爆出火花。

俄國工運低迷，工人消極被動的因素，主要有四大方面：一，工人的可見工資雖然大幅下降，但消費卻沒有相應減少。這方面，主要是工人獲得分配小片土地，可以生產自己消費的糧食，而且，他們大量做非法兼職，有了其他來源的收入補貼。

第二，在經濟陷入深重危機、生產下降時期，當企業的開工率降到只有常態的三分之一，罷工行動不容易獲得成功。成功的罷工行動，一般在經濟增長時期更多。

第三，1989-91年的罷工運動取得了全國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也沒有遇到政府大力反對。但是，在1992年後，新聞媒介一致譴責所有罷工行動，而管理層、地方和聯邦政府，也用盡一切手段鎮壓罷工，從開除到起訴不等。

第四，工人缺乏組織經驗，也沒有在鬥爭中組織起來保衛權利的經驗。傳統的工會結構，在蘇聯時代已經僵化，失去活動能力，往往傾向妥協，而新興的工會仍然微弱。

俄國工運新發展

在1992-93年間，工人一般採用普通的罷工方式來爭取應有的工資。這些行動容或勝利，勝利也是局

部而短暫的，迅速便被深化的經濟危機吞沒；2-3個月內，便迅速把工人爭得的成果，例如增加了的工資，用通貨膨脹的形式收回。

繼後的日子裡，俄國工人更多用走投無路和絕望的方式行動，例如工人、醫務人員、教師等此起彼伏的絕食浪潮。待到這種絕望行動被政府和僱主熟視無睹，在1996-97年間，工人轉以激烈的行動作出訴求，從而出現堵截鐵路交通線的行動；在1998年，礦工更派出代表前往莫斯科作長線示威，並且提出政治要求。政府和管理階層對這些堵路行動和在首都示威的行動，最初是被迫作出妥協，因為堵路影響了沿線的經濟活動和利益。工人方面，一旦要求得到回應，也是立即收手。然而，政府和僱主日漸採取強硬的行動，運用軍警鎮壓和法庭起訴等行動雙管齊下，打壓工人。所以，工人縱然得到一時的勝利，但長遠來說，仍然是輸家。

鬥爭策略改變

激烈的市場「改革」經歷8年之後，工人運動的鬥爭方面，開始有了新的取向；不過，在這方面的例子，還是寥寥可數，而且只見皮毛。但變化的跡象還是出現了。

主要的是，工人從消極被動的抗議戰術，轉而變為主動鬥爭，爭取改變工作條件，而且鬥爭的方式也有了改變，那就是採用工人接管工廠的生產管理的形式。

這樣的鬥爭，從1998年開始，在個別地區個別工廠發生了好幾宗。例如在圖拉州的一家機械工程廠，工人為了防範管理層變賣廠房資產，主動接管了生產的控制權，實行了工人管理，把舊的管理層趕走，實行由工人自己選出廠長。行動被法庭判以非法，還把工人選出的廠長拘捕。不過，工人仍然成功的使前任廠長和舊管理層的數個成員受解僱，而且，工人組成的罷工委員會仍然得以設立管理機制，監察工廠的銷售情形，以杜絕廠方做假賬。管理層被迫採

納了工人這個創舉。

在其他地方，也出現異曲同工的停工情形。在過去，工人用停工來佔據工廠的行動，一般是迫使生產停頓下來，以強迫管理層向工人的要求讓步。在近數年間，已發生過的十多宗相同的工人行動——工人佔領工廠，控制工廠資產，而且繼續開工。這些行動，並且獲得了其他工廠發動的同情罷工來支援。

在俄國，工人的鬥爭行動，一般不會被新聞媒體報道；縱使得報到，也是大話連篇的負面新聞。工人的行動愈成功，受傳播媒介的打壓、歪曲便更甚。在列寧格勒州的蘇維埃茨基市一家製紙工廠的鬥爭，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這家紙廠從1993年開始轉為私營，在這個過程中違反了多條法律。股份新擁有和管理層購下了工人全部股權，然後把工廠再轉手，這個過程也同樣的有多起違法行為，只指出一點便夠了：轉售價比工廠的賬面售價低了4.5倍，而且新買主只支付了5分1的訂金，不用再花分文，便取得了工廠的擁有權。地方政府在1980年代曾經投下了7億美元更新廠房及設備，新買主現在僅付出3.8百萬美元便取得了工廠的業權。

工人接管工廠生產

即使這樣，這個工廠的真正物主變得神秘起來，查起賬目，發現前前後後都是一連串虛假的資料，例如自稱屬於英資，卻發現在英國並無註冊，而買主也不是英國人。實際的買主，其實是地方上的大酒販。在1995-96年，為了訛騙工廠割價出售，當時的廠主宣佈破產，致使售價大降；新買主購入後，企圖把廠房及設備全部再轉售，只保留一個木材轉運站。這個發展，被地方上的法院裁定違法，下令停止交易。但新買主仍然控制著工廠實權。事情發展至此，工人終於忍無可忍，佔領了工廠，設置工人護衛隊看守，選出廠長，繼續生產，實行工人獨立管理工廠。

工人接手管理工廠後，一夜之間，工廠從原來的破產變成有利可圖，工人不僅獲得加薪，發還欠薪，而且還有餘力，支付工人的社會福利，向政府繳交稅款！

廠主最先派出私人保安公司嘗試收回工廠，行動失敗後，得到政府支持，派出鎮壓部隊與私營保安部隊雙管齊下，向工人進攻。此外，工廠的未來買主，

強迫鐵路局停止運載供應給該廠的生產物資，也不准運出製成產品。不過，工人早有準備，已組織好陣勢迎接突襲。這支工人糾察隊恭候在辦公室部門，迎接這支一向用來鎮壓監獄暴動的「旋風部隊」。工人糾察隊內，有6成是手無寸鐵的女職工。「旋風部隊」知道無法突破工人的防線，便毆打了幾個工人，抓住他們做人資，而且恣意破壞廠房，造成嚴重的物資破壞。當工人派出代表試圖與「旋風部隊」談判，卻被開槍傷害，造成了兩名工人受傷。最後，在工人的盛怒下，未來廠主把部隊撤走。

在1990年代中，當工廠宣佈破產，工人只是逆來順受，勒緊肚皮，到了飢不裹腹，僅能靠社會福利救濟度日，而且仍然不作反抗。現在，工人一旦把工廠接管，發現自己是能夠令生產線朝氣勃勃，興盛運作，他們便拒絕妥協，拒不交出工廠。

工人支援工人

新聞媒介當然是盡情捏造，詆譏工人鬥爭的客觀背景，歪曲事件的真相，而社會的反應也各有不同。在聖彼得堡和列寧格勒州一些工廠，工人進行募捐，資助進行鬥爭的紙廠工人。在列寧格勒，一家金屬工廠的工人也組成工人縱隊，而廠內的工會委員會把自己的辦公室轉為團結支援中心，組織示威行動支援紙廠工人。在莫斯科，國會杜馬通過議案，支持紙廠工人，議案僅有一票的反對。在學術界，一個名為「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協會」的組織，也迅速派出慰問代表團，並且和一部份杜馬成員，偕同紙廠工人的代表，舉行新聞招待會。這個鬥爭仍然繼續發展，仍然不知道結局。

歷史的嘲諷：俄羅斯倘能產生一個有實效的「企業階級」，這個階級就不是那些藉著私營化而盜竊國家公產的「新俄羅斯人」，而卻是有組織的工人！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5月號）

(來論) 困擾蘇聯的猶太人問題

趙京

1996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學作訪問研究時，學校裡曾舉辦過一場「猶太人在蘇聯」的展覽與講座。在最後的備有晚餐的講演上，我注意到只有我不是白人。一位來自紐約大學的猶太人教授總結猶太人又一次從蘇聯「出埃及」到美國或以色列定居。我在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不斷接觸到猶太人支配美國外交政策的情況。據說，控制美國的「中國研究」的美國名牌大學中的猶太人教授們曾秘密協議阻止中國人擔任美國大學裡的政治學系教授，因為「大量中國人擔任美國政治學教授會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我知道邀請我的弗里德曼教授是猶太人，他告訴我在冷戰時猶太人就開始注意中國。他雖然對香港、台灣興趣不大，但因為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只好去香港、台灣學習中文。

我後來又有機會與來自蘇聯的猶太人移民在相同的兩個公司工作，對他們敵視蘇聯的態度感到不安與不解：這些30、40多歲移民來美國的猶太人固然比不上在美國生長的猶太人，但他們在蘇聯並沒有受到歧視，為什麼如此鄙棄自己生長的「故土」呢？我由此體會出一些世界各地（除美國外）排猶的情感：你既然不把此地作為祖國，為什麼又千方百計地控制此地的經濟、金融、新聞以及政治呢？我本來在參觀諸如華盛頓的「集中營紀念館」時很同情猶太人僅僅因為宗教上的歷史糾紛（「謀害耶穌」）被基督教世界迫害的歷史，但當我逐漸了解到猶太人的一系列宣傳手段後，把這些本來似乎「善惡分明」的現象也作為「猶太人問題」來看待了。

「猶太人問題」最初來自於俄羅斯帝國。猶太人被羅馬帝國武力征服後不可能在中東維持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決議放棄武力建國的企圖，開始了所謂「大流散」（Diaspora）。伊斯蘭教因為起源於猶太教（《舊約聖經》），對於猶太「兄弟」尚屬客氣，除了稅賦外並沒有實行宗教迫害。相反，基督教世界（法國、西班牙等天主教勢力）排猶事件不時發生。究其根源，與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筆下的那種憤恨猶太人奸詐、富豪的情緒有關。猶太人在基督教不很盛行的東歐比較自由，可以在相對廣闊的烏克

蘭、白俄羅斯平原建立自己的社區，與外部不相往來，發展出不同於希伯來語的意第緒語（Yiddish）作為流散的猶太人的公用語。1897年俄國人口普查時有5,215,800猶太人口，是猶太人最多、最集中的國家。這批龐大的、夾雜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人中的猶太人處置問題令沙皇俄國不知所措。

猶太人被指控參與1881年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活動而受到迫害，到1914年為止，約有兩百萬猶太人移民離開俄國。猶太人由此積極投入推翻沙皇專制的鬥爭，在1897年成立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猶太人勞工總同盟（Bund），在1898年參與創立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雖然猶太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受到歧視，但他們畢竟居住在城市且擁有較高的職業技能，在俄國革命初期階段比較容易從貧困工人、農民、士兵中脫穎而出擔任領導職務。實際上，領導俄國革命的五名布爾什維克核心成員（中央委員）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猶太人。

斯大林以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文章奠定他作為黨內處理民族問題的權威。在俄羅斯人列寧去世後，作為格魯吉亞人的斯大林能夠打倒三位猶太人政敵，多少與俄羅斯人反感猶太人的情感有關。格魯吉亞人在沙皇俄國時代是落後民族，俄羅斯人不擔憂斯大林會依靠格魯吉亞人統治蘇聯。斯大林在確立其獨裁地位後，讓猶太人卡岡諾維奇負責猶太人事務。

蘇聯的猶太人政策在斯大林統治下，首先通過一系列政治事件（如「猶太人醫生謀殺蘇聯領導集團」冤案）把猶太人從注目的高層、職業性職務中排除。同時，為了對抗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在廣闊的蘇聯境內劃出一塊區域讓猶太人自治，不失為一著好棋。

1934年5月蘇聯在遠離莫斯科8千公里，其面積大於今天的以色列靠近海參威的西伯利亞鐵路的Birobidzhan建立猶太自治區（J.A.R.）。這是一個注定不能成功的項目：猶太人多生活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平原，不願意去西伯利亞、遠東，他們又不會、不願開荒種植，中國和日本同時也可能要求這塊

領土。J.A.R.的猶太人口從沒有超過當地居民的20%，現在只有5%以下的人口。

戰後，斯大林爲了懲罰克里米亞半島的伊斯蘭信徒韃靼人在戰爭期間配合德國，把他們趕到中亞高加索山區。在猶太人中曾傳出希望，認爲斯大林計劃把克里米亞劃給猶太人自治。這可以接收、吸引歐洲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才智、金錢和商業網絡，建成蘇聯的加利福尼亞或香港。可惜，這位蘇聯的「民族問題權威」不信任猶太人。1948年，蘇聯的猶太人政策隨著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槍聲而破產。

蘇聯雖然在聯合國出人意料地贊成以色列建國，但以色列的存在完全決定於美國的支持。這樣，在美蘇對峙的冷戰中，猶太人作爲一個種族全力投入美國

陣營，爲美國最終瓦解蘇聯扮演了別的民族辦不到的角色。特別在冷戰後期，基辛格（以及後來的阿爾布萊特）等猶太人直接主導美國國務院、把美國的利益陪葬在以色列的利益上，連保障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的「人權」（如出國移民自由）也成爲美國壓迫蘇聯的籌碼。

猶太人問題仍然不時出現在目前俄國的政治選舉中（如常常獲得第三多選票的雅可布列夫是猶太人），但是隨著蘇聯（以及更早的納粹德國）的瓦解，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權力已經與猶太人形成同盟，把「猶太人問題」的苦果拋給阿拉伯的伊斯蘭世界。

（寫於2002年4月10日）

（來論） （美國）勞動黨印象

趙京

我到美國來後，盡量利用條件實地參與、研究美國的各種進步團體和活動。與日本的左翼團體一樣，美國的進步團體之間關係複雜，所以我一般在一段時間內只參加一個團體，在基本上研究清楚其主張、政策、歷史與現狀後就逐步脫離，轉向另一個團體。我訂閱、接受那些曾經研究過的團體的出版物，繼續觀察。

今年春天我參加聖何西（San Jose）和平中心主辦的「北加州和平運動團體聯合會會議」中關於美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分科討論，認識了勞動黨成員的主持人。他向我們介紹勞動黨（Labor Party）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聯合各種團體、推動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

1992年民主黨的克林頓剛任主白宮時，爲了答謝工會等支持者，曾由克林頓夫人主持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案。但此嘗試很快被保險公司在華盛頓的賄賂收買擊敗、不了了之。1996年在華盛頓成立的勞動黨主要就是由不再對民主黨抱有幻想的工會們推動成立的。在由1,400名代表出席的成立大會上，勞動黨宣言：「在至關勞動人民生活的

最重要議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關稅總同盟（GATT）、健康、醫療、以及組織工會、集體交涉、罷工的權利上，民主黨與共和黨都出賣了勞動人民。」

我接受邀請，隨後出席了勞動黨聖何西支部每月一次的晚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當即填表簽字、交納「黨費」，成爲一名普通的勞動黨黨員。

晚會由我們都熟悉的菲爾與安妮夫婦的古它演奏開場。這對老夫婦靠古它演奏爲生（可從網上收聽他們演奏的美國傳統歌曲：www.ambergrass.com），每逢進步團體集會，總缺不了他們。從他們的演唱中，我真正體會出音樂的社會功能，感受到另一種（淳樸、友愛、蔑視金錢權勢的）美國。我們順著「拳擊者」（Boxer）民歌的調子，開心地合唱「我這個大混蛋」的歌詞：「我是一個政客，喬治·布殊是大名，……」。

我們接下來觀賞兩個勞動黨製作的宣傳錄像，並進行討論。

第一個錄像是介紹跨國公司以及支持它們的國際經濟體系，如何摧毀中南美洲的當地經濟與民眾生活

的。我從德國傳統較濃的威斯康辛州移到加州後，立即注意到這裡的最大「種族」是講西班牙語的拉丁系人口。他們是美國與中南美洲的聯繫紐帶，是各種政黨爭取的票源；他們也最理解中南美洲人民的苦難與奮鬥。例如，在幾乎所有的被納入美國經濟體系的國家中，普通民眾唯一改善生活狀況的途徑就是想方設法「偷渡」一個年輕人到美國打工以救濟親屬。但墮落的國際經濟體制贏利的前提就是廉價勞動力不許移動，所謂「自由貿易」只是支配錢物的資本家階級自由移動的權力。勞動黨提出「公正貿易」的口號取代「自由貿易」，主要著眼於限制錢物的移動。

我介紹了中國勞工「偷渡」的事例，以及日本的外籍勞動者的受歧視狀況，並提出「開放國界」的概念作為另一種選擇：允許勞動者自由移動到任何能夠提供較好待遇的國度、城市。這也是歐盟（EU）與NAFTA、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機構的不同之處。我知道具有反共、「愛國」傳統的勞聯—產聯（AFL-CIO）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口號，勞動黨內的工會也不願顯得激進，嚇跑可能的同盟軍。以我的經驗，我也深知許多在下層支部、成員中的民主的、革命性的要求幾乎沒有可能在官僚化的中央機構中表示出來。幸好擁有兩百萬成員的勞動黨尚處於成形階段中。

另一個錄像就是揭露目前醫療保險制度的罪過。除了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多採取強制性的「全民保險」體系，由政府監督統一管理，節省許多不必要的競爭浪費。我在日本期間，可以自行選擇醫療而且只需付10%的費用（一次兩、三百日元）。但美國的醫療保險，完全由「市場利潤」支配，非常貪婪、違反人道，而商業化最發達的加州最殘忍。聖何西是硅谷中心，富人居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窮人居住在市中心。在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富裕小城集中了八家醫院，而整個市區只有一家醫院。這家醫院被一家公司收買後計劃搬出市中心，勞動黨聖何西支部與許多組織正在動員、請求市政府出面留住這家醫院。

美國的保險金額、程度五花八門，除了浪費在無益的行政管理、市場競爭的開支，保險公司上層人物的報酬也與高科技公司的總裁們一齊。結果造成全美有1/5的人根本付不起任何保險，同時有1/3醫院設施空閒不用，與市場「看不見的手」支配下的農牧產業等相似：有許多人沒有溫飽，同時有許多鮮奶、蔬菜、肉類卻必須埋掉以保持價格不降！前兩年，聖

塔·克拉拉縣（下轄聖何西及附近城市，即硅谷地區，年輸出產值與紐約並列全美第一）收到煙草公司追繳的一大筆意外稅金，頗具革命精神的縣議員們提議給予全縣18歲以下少年兒童免費醫療保險，但最終未能實現。

勞動黨把改革醫療保險制度作為首要目標，是很明智的戰略決策。與西方國家相比，改革最落後的美國醫療保險制度，並不比當年民主黨人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激進；相反，因為現在的民主黨墮落到與共和黨相差無幾，才不可能推行這種溫和的民主主義改革。勞動黨如果能夠成功地團結大多數美國人達到這個目標，可能會確立自己作為獨立於目前為止的兩黨專制之外的第三黨地位。

當然，如果意識到在硅谷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生產力地區的上百萬人口中，只有三十人左右參加勞動黨的晚會，就可以明白這將是多麼困難的工作。為了不嚇跑任何可能的同盟者，勞動黨的正式文獻沒有提及「社會主義」這個詞，但它的政策、綱領明顯帶有社會主義成份，能否把人數不多但戰鬥精神強盛的社會主義各派別、無政府主義團體動員來共同工作頗不容易。在最基本的反對資本家、保護環境、社區等課題上，勞動黨能否與注重選舉戰略的綠黨合作，也很難辦。如果勞動黨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投入競選，還會加劇與那些附屬於勞聯—產聯的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工會組織的矛盾。這些都使得原計劃在今年春季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推遲到秋季舉行。

我同意這樣的美國史觀：即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完成了自廢奴運動以來的第二次美國政治革命，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選出了不少黑人、拉丁系人進入國會和地方政府部門；現在，美國需要以經濟正義為直接訴求的第三次革命。冷戰的結束不僅擊垮了作為挑戰對手的社會主義政治集團，同時也在隨即的「後冷戰」展開中征服了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日、歐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確立了以華爾街為象徵的「一美元一票」的股份市場支配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整個人類的生存都被日益深重地套在越來越龐大的世界賭博機器上、把人類財富向越來越少的人積聚。

從這個意義上看，勞動黨在美國為爭取經濟正義的鬥爭，直接影響到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值得關注。

（2002年6月8日於聖何西）

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

曼古蘇

「世界社會論壇」再度在巴西阿雷格里市舉行，這次盛會從今年1月31日至2月5日，共召開了6天，與會人眾多達6萬人，他們來自全世界131個國家，其中，有1.5萬青少年參加了青年營。在論壇期間，舉行了多個研討會和講座，並有多達7百個工作坊、示威、辯論和推銷書籍活動。

來自秘魯的農民運動老將和托洛茨基派領袖雨果·布朗哥形容這個「世界社會論壇」是一個「不受人操縱的國際」。這是一個由民間社會運動組成的世界論壇，不是自上而下地組織，而是由各參加者平等組成，各為自己的活動和議題負責，而不受制於一個既定的綱領。「論壇」由巴西委員會實際組織，它由8個組織和約有60-70成員的國際委員會組成。第二屆論壇在9.11事件及美國進侵阿富汗之後舉行，其主題亦相應地關注發展一個尋求和平及社會正義的另

類出路。另外，它也進一步深化下列課題，以期為促進人類團結全球化的遠景建立戰略：

- 保存人類某些不可分割的方面，免受市場操控，如醫療、教育、水、文化、不可更新的資源等等；
- 撤銷第三世界負債，管制金融市場，管制國際資金活動，方法包括向國際資金徵稅，撥歸公款，用作人類燃眉之急的需要，如救援飢荒和赤貧；
- 促進參與性民主，例如仿效阿雷格里市十分成功的民主參與制訂財政預算案的程序。

「論壇」以大遊行拉開序幕，也以大遊行結束。第一天的遊行主題是「反對戰爭，贊成和平；另類世界有明天」。閉幕遊行的主題，是「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協議」。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4月號）

一次大飛躍：在巴西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

喬丹、勒克拉克、魯塞特

在去年舉行的第一次世界社會論壇，與今年1月3日至2月5日在巴西舉行的第二次世界社會論壇之間，人們看到了一次大飛躍。新的國際團結已在巴西阿雷格里市形成，那時阿根廷危機證明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破產，而華盛頓所推行的是「不斷戰爭」政策。

論壇的一系列成就是顯而易見的，有700家工廠和車間參與，召開數十次會議，兩次盛大的示威遊行，還有青年與農民集會和眾多的倡議。動員的規模證明比去年大四倍。巴西和國際人士的參加人數，也大為增加。最大的外國代表團來自阿根廷和意大利，繼之而來還有法國（500多人）、美國（420人）、西班牙、智利、烏拉圭以及加拿大代表團。

不少巴西人為9.11事件的後果而憂心忡忡，但

有跡象表明，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努力仍在不斷地加強。甚至在美國紐約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也遭到了街頭示威的抗議。這些示威抗議是勞聯——產聯工會總同盟以及其他團體號召組成的。

社會團體的呼籲反映出這種進步性。如同去年一樣，呼籲書譴責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嚴重的社會和生態效應，並重申傳統要求（如廢棄第三世界債務）同時呼籲書還聲明反對戰爭，要求與阿根廷、巴勒斯坦人民團結起來，最後提出在2002年和2003年召開集體動員的國際日程表而告結束。

布殊的好戰演說，在巴西極不得人心，最近幾個月來，巴西有7位聲譽卓著的工會和政界領袖遭到暗殺，其中兩人是工人黨的市長。CUT總工會、聖保羅辦事分處，在世界社會論壇會議期間，遭到一伙武裝

人員的襲擊。但這並沒有妨礙美國新任國務卿來到拉丁美洲時，照常指責三大冒險行為——即哥倫比亞事件、阿根廷危機以及巴西工人黨候選人盧拉（Lula）在下次總統競選中的可能勝利。這就無異於給巴西的敢死隊開放了綠燈！

就這層意義來說，在世界社會論壇屬下的世界議會論壇的主要工作，就是戰爭問題了。大部份意大利代表強調譴責戰爭，毫不隱諱地反對阿富汗戰爭。以法國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抵制剛才所提到的戰爭行為。最後在戰爭問題上通過兩個決議，其中之一是集中在阿富汗問題上。另一決議聯繫到阿根廷危機，取消對古巴的封鎖，抵制哥倫比亞計劃以及華盛頓強加在本大陸的美國自由貿易區問題。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倡議構築國際議會網絡，這一倡議在2001年時已原則上通過。

第二次國際青年營同樣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有來自40個國家的15,000名代表參加。工廠、車間討論會的實質反映出资本主義全球化青年運動中真正受到集中關注的主題：行動的方法方式，反對就業不穩的鬥爭，恢復工會聯合的直接行動，等等。

拉美各國（巴西、阿根廷等）的群眾性參與，代表不同部門的加入（學生、民間組織以及其他全球化運動或政治組織），都可說明這是國際範圍內青年鬥爭統一行動的充滿希望的信號。2003年第三次青年營的艱巨任務是：建立包括亞、非兩洲的真正國際代表會。2002年底召開的區域性論壇必將對此大有幫助。

助。

婦女的要求，是論壇自始至終的主題。巴西婦女發起的「婦女向世界進軍」，已做出十分出色的工作，使反暴力、反貧困的要求得到推廣。「世界進軍」運動還組織一次討論會，討論「爭取女權運動者要選擇另一類世界」，並召開有關「反對婦女的家庭暴力」會議。

在阿根廷鬥爭中有關婦女地位的辯論，已由爭取女權積極份子送上了《鬥爭中阿根廷婦女》的互聯網，與此同時，一位阿富汗婦女協會的代表應邀參加世界社會論壇，並作了阿富汗局勢的報告。「爭取女權運動」的參加論壇，她們在論壇開幕那天出現在遊行示威隊伍中，以及提出反對美國自由貿易區口號等等，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向世界進軍」運動參加起草社會運動的最後聲明，聲明還包括確保婦女權利的要求，如男女工資平等，譴責性別歧視及剝削等等。

當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即將在阿雷格里市再次召開時，決定下次會議在印度召開，而2005年的會議地點將在非洲，從下一個秋天起，區域性論壇將在歐洲的意大利開始舉行。

阿雷格里市的論壇會議，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新的國際主義在這裡形成了。世界社會論壇發展成為真正的進軍。

（黃申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3月號）

巴黎公社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貝薩塞諾、奧利維埃

阿根廷幾乎每天都向著危機滑下去，而且越滑越深。2001年12月，工業生產下降20%，每天有成千上萬阿根廷人民陷於貧困；官方也不得不承認，有1500多萬人列入貧困，其中500萬人列為特困戶，整個工業部門失業的人數成倍地增加。經濟癱瘓正逐漸地向全國擴散，看來阿根廷正處於解體過程中。

2002年2月4-5日，阿根廷各銀行，由於受到政治危機新階段的直接影響而再度關閉；2月1日，最高法院不得不宣佈，銀行限額提款計劃（Comalito

plan）是違反憲法的。

阿根廷的政客、法官是腐敗透頂的，他們還同前總統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n）的極端新自由主義派相勾結，政府受到了瓦解的威脅，正因此，這個國家力圖要度過這次政治危機。然而國家最高層的四分五裂，是阿根廷所經歷到的深刻危機的表現之一。儘管整個體制並沒有崩潰，國家仍然存在，如果軍隊在此階段不加干預的話，這個國家有可能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下去。但是，統治階級所擔心的是：腐

敗政治已經到了糜爛的程度，經過兩次政府垮台之後，現在還面臨著最高法院的解體，整個國家大廈似乎是徹頭徹尾地腐朽下去了。

統治階級的這種憂慮，因下列兩個因素相結合而加強了，一是兩大傳統政黨（貝隆主義法制黨與急進黨）的危機，二是社會上反政客、反政府、反國家的群眾自衛組織大規模運動的出現。

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在全國群眾集會的不斷出現，是最近幾周來的最重要現象。這過程僅僅只是個開始，但自從2001年12月19-20日起義以來，社會總動員已在不斷地擴大。整個社會都在動起來了，所有社會的、政治的問題已成為每日生活中的問題。

今天（指作者寫作此文時的日子），全國有一百多次人民群眾集會。所有集會的人民群眾都把他們自己稱為「街區近鄰住戶」。有些社會學家或學識淵博的觀察家們指出，這樣的群眾集會是具有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然而，很快，迫切的問題提出來了：如何幫助受到打擊最大的兒童、失業者 and 特困戶呢？如何解決迫切糧食問題呢？如何促使藥房把藥品提供給醫院呢？

運動的弱點之一在於：工廠、車間的工人並沒有參與，阿根廷的工人階級——一度曾是拉丁美洲最強大的力量——在新自由主義打擊下潰散了（約70%以上是失業工人）。然而，除中產階級之外，仍有一部份工人（就業的或失業的）作為群眾的「近鄰住戶」參加了這些集會，而且在反對解僱的第一線上，已同工會有了接觸（特別是在鐵路部門）。如何協調這些自衛組織的結構問題，將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

人民運動早已普及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各省的極大多數居民街區中去。每一街區的這些集會，由100到200人組成；在動員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區，當人數到達數百人以上時，便分成各小組。除了討論最重要的問題之外，他們一般以小組或委員會形式組織起來，這些組織還同媒體結合起來。

一支真正的數以千計的社會先鋒隊已經誕生了，他們當中有年輕一代，也動員了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和老戰士，這支社會——政治先鋒隊正開始對緊急措施的一般性討論以應付危機，他們提出把銀行國有化，在公共部門重新組合私人企業，廢除債務，支付工資和養老金等等。最後，所有這些集會都表示要對在巴西阿雷格里市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熱烈支持。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3月號）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七)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五章

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

群眾的自我組織與先鋒黨之間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它從來沒有被真正地、有系統地討論過。這也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雖然恩格斯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談到這個問題，而馬克思在較小程度上也曾談到。〈1〉

如果我們閱讀討論這個問題的最有名的著作——列寧的《怎麼辦？》、盧森堡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問題》、考茨基反對伯恩斯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的論著、列寧的《左翼共產主義：一個幼稚病》和奧托·鮑厄爾的《非法政黨》——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都是富於爭論性的。它們並沒有試圖有系統地討論這個問題。喬治·路卡克斯的早期著作，《歷史和階級覺悟》和《列寧》，有著如此高度的抽象性，以致不能被認為是對這個問題作過有系統的處理。格拉姆西在1920年代早期也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幾篇在報紙上發表的不連貫的文章而已。〈2〉

然而，當我們看了某幾個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著作的時候，情況就改變了。列寧和盧森堡對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中心問題思考了四分之一世紀以上。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是他們的幾十年經驗所豐富的思想成熟的證據。根據這些著作，我們才能夠構造一個完整的理論。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在每一個細節上同意我們。

托洛茨基，因為比這兩個人活得長久，所以能夠依據更豐富的國際經驗來處理這個階級與黨、自我組織與先鋒組織的問題。他個人對於十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非常熟悉，而且能夠研究其他國家的經驗。他能夠分析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新現象，而且能夠分析與它們鬥爭的方法。也許正是因為這樣豐富的經驗，他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比列寧、盧森堡的貢獻，更多種多樣。

托洛茨基對黨與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的問題

的基本立場至少改變了五次，雖然無疑地有一條共同的"紅線"貫穿了所有這些立場。儘管就列寧和盧森堡而言，綜合他們的觀點是可能的，至於對托洛茨基，我們須要嘗試的，是把他如何發展這個問題的觀點，作一個評價。

作為中心的先鋒黨

在缺乏自我組織的情況下的各種危險

我們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完全支持列寧、馬爾托夫和普列哈諾夫在第一個火花報中與"經濟派"的鬥爭。列寧非常看重托洛茨基的貢獻，稱他為"筆鋒"。托洛茨基之參加火花報編輯部為其最年輕的成員，應該歸功於列寧。

更重要的是，他1901年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早於列寧一年，著重建立一個中心黨的必要性，以之作為對工人階級的片斷、局部、當前的經驗進行概括、幫助建立一種政治性的階級覺悟的道路。〈3〉就是這個政治目標，不是什麼組織觀念，成為列寧的集中主義的主要元素。不幸的是，托洛茨基在1902年至1916年期間失去了這樣一個洞察力。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其第二次大會上發生了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與少數派（孟什維克）之間的第一次分裂。托洛茨基在這次分裂中站在孟什維克的一邊。〈4〉

他與列寧的激烈爭論，引致他在1904年發表他的以下述文句出名的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鑒於俄國共產黨和蘇聯歷史的日後發展，這段文句，不但有點戲劇性，而且簡直是個預言：

就黨的內部政治而言，這些方法將會導致一種情況，首先是黨的核心組織以它自己代替了黨；接著，中央委員會以它自己代替了黨的核心組織；最後，一個獨裁者以他自己代替了中央委員會。〈5〉

無數在政治上反對列寧的人以及歷史學家，把在蘇聯發生的種種事態進程看成為對托洛茨基早期觀點的正確性和對列寧觀點的不正確性的證實。〈6〉據說，托洛茨基在1917年改變了他的立場，認為他的早期觀點是錯誤的。〈7〉真實的情況是有點不同：托洛茨基和盧森堡都對列寧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從具體歷史環

境來看待列寧在《怎麼辦？》中的立場，以為它們具有普遍可以使用的性質。〈8〉

列寧寫這本小冊子的用意，是要處理非法政黨的當前任務和幫助準備一個廣大、獨立和政治的工人階級群眾運動。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得出一個有關黨與階級之間關係的一般理論，他的觀點當然不是階級應該附屬於黨。他在這本小冊子中寫了以下的句子，其筆調非常相似盧森堡或托洛茨基的筆調：

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只有牽連到自動開始鬥爭的真正革命階級，才有意義。每個人都會同意，"廣泛的民主原則"包括以下兩個主要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完全的公開，其次是所有行政管理人員都要由選舉產生。我們可以說德國社會黨的組織是民主的，因為在該黨內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包括它的大會。

經歷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之後，他更清楚闡述以上的觀點：

看看整個革命前時期及革命的頭二年半（1905-1907），把這整個時期中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在統一、組織和黨的連續方面，與其他政黨比較一下，你不得不承認，在這些方面，我們的黨毫無疑問地比所有其他的--軍校學員黨、社會革命黨等等--都優越。革命以前，它起草了一個綱領，正式地被所有社會民主黨黨員接受，當修改它時，也沒有因這個綱領而發生分裂。從1903年到1907年（正式地說來，從1905年到1907年），社會民主黨，雖然在它的黨員之間有了分裂，但是仍然給大眾關於黨內情況的最充分的資料（第二次全黨大會、第三次布爾什維克會議、第四次全黨大會或者斯德哥爾摩會議的會議記錄）。雖然有了分裂，社會民主黨仍然能夠比任何其他政黨更早地利用一段暫時自由時期，來建造一個具有理想的民主結構的合法組織、一個選舉制度和根據參加組織的成員人數而產生的大會的代表制。〈9〉

……對我來說，拉金同志提出工人代表蘇維埃或黨？這個問題似乎是錯了。我認為，這樣提問題是錯了，這個決定當然應該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和黨。……

對我來說，工人代表蘇維埃，作為一個代表所有行業的組織，似乎應該力求包括從所有工業、專業和辦公室的工人、家庭僕人、農場勞工等等來的、從所有那些要和能夠為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爭取較好生活的人們來的、從所有那些至少有基本的政治誠實的人們來的、從黑色百人團除外的所有的人們來的代表。〈10〉

列寧非常看重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角色，〈11〉雖然托洛茨基與他屬於不同的派別。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不同派別之間的關係，列寧在1905

年革命後不久寫道：

我們大家都同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同意保證所有少數派、所有忠誠的反對者的權利，同意每個黨組織的自治，同意承認黨的所有負責人必須由選舉產生，必須對黨負責，必須能夠被罷免。我們把在實踐中遵守這些組織原則、忠實地、堅持地應用這些原則看成為防止分裂的保證，一個使黨內的思想鬥爭能夠、必須與嚴格的組織統一、與大家都服從統一大會的決定充分地一致的保證。〈12〉

從以上的這些引句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說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的理論與實施早就在列寧的組織模式中存在，是完全毫無根據的，根本與實際的發展過程不相符的。

孟什維克派的路線完全低估了非法活動、階級活動的中斷、把分散的鬥爭經驗綜合在一起、為工人階級的政治自主而鬥爭、以及以後為工人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等等所造成的困難。〈13〉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大會上的分裂，已經包含了日後展現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關於俄國資產階級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角色問題上的決定性分歧的核心。〈14〉

孟什維克的這些立場並沒有得到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支持。事實上，由於托洛茨基認為工人在俄國革命中應該在政治上獨立，他已經站在布爾什維克的左邊了。這些觀點是總結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中，而且已經完全被1917年的十月革命所證實。列寧在他的《四月提綱》中，實際上很可能在沒有讀到托洛茨基從1904年到1906年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的情況下，得出了同樣觀點。〈15〉

雖然列寧在群眾革命活動的上升期中，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代替主義"，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可不是這樣。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在開頭對於創立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問題上，採取這樣一個小心的、如果不是明確地仇視的態度，只在後來，才參加和完全支持它。

托洛茨基是第一個人承認，蘇維埃是歷史本身為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為了它將來行使政權而創造的形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經典之作中所表達的，以後被格拉姆西、共產國際和卡爾·科爾施等等用社會學和理論的形式所發揚的，早就被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寫的《Results and Prospects》〔中譯為《總結與展望》〕中預料到了。〈16〉

蘇維埃（會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機關。〈17〉這已被荷蘭左派共產黨人、Pannekoek〔音譯為潘內科厄克〕和Gorter〔音譯為戈爾特〕等人的失敗和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的失敗所證實。群眾性工會能夠在資

本主義的穩定期中增長和茂盛，但是蘇維埃就不能夠。同樣地，在工人們奪取了國家權力以後，工人階級自我活動的任何衰落能夠限制、甚至結束蘇維埃之作爲工人階級直接行使權力的機關。因此蘇維埃本身不是一個普遍可使用的萬應靈藥，它們只當與其他組織形式--群眾性工會、先鋒黨--連結起來的時候，它們之作爲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工具，才能發揮效力。

群眾活動在缺乏先鋒黨的情況下衰落的危險

使蘇維埃存在的這些必要先決條件，引起了階級自我組織（一個非常不平等的進程）和永久性的先鋒黨之間的辯證相互作用。永久性的先鋒黨的群眾影響力的大小和程度，也受到局勢的退潮和漲潮的影響，但是這樣的黨比較穩定，在行動上有更大的連續性，而且更能抵抗不利情況的壓力。先鋒黨的消失和它在工人階級中生根的幹部的喪失，會使日後群眾行動的復甦更爲困難。

這是托洛茨基沒有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斯德哥爾摩大會上認識到的一些事情。他對來自"取消派"（那些不要在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繼續從事秘密鬥爭的孟什維克）的危險的低估；他的無原則的結盟，不顧重大的政治分歧，他的事實上使組織問題與其政治內容分離的調和主義（局部地由於德國"中派主義"即考茨基的影響，雖然他比列寧更了解考茨基的政治局限性）--這些從1908至1914時期而來的錯誤是十分重大的。它們以後在俄國共產黨內所展開的事件中將會有嚴重的後果，因爲它們滋養了"老布爾什維克"對托洛茨基的不信任。

引起托洛茨基在這個時期的調和主義的，是對工人階級自動能力的高估。根據這種高估，工人階級不但會自動發現解決國家權力問題的正確、必要的方法，而且會自動以某種方式將這個方法強加給在這個問題有著分歧的社會民主工黨。〈18〉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1905-1906時期實際發生的事情的不適當概括，雖然在當時它曾導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重新統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1912年開始，可能是從更早時期開始，孟什維克在政治上向右轉的行動，使這事情不可能發生。托洛茨基直到二月革命爆發以後才認識這一點。

反對取消派的鬥爭，換句話說，列寧甚至在反動時期仍然堅持政治先鋒黨的連續性，證明它本身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使它更容易在1912年以後再度促進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一個爲了察看俄國問題而成立的、由第二國際主席團的成員Emile Vandervelde擔任主

席的觀察員委員會，於1914年到俄國旅行之後，報告說，在新近興起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布爾什維克幾乎毫無例外地扮演領導角色。〈19〉這就駁倒了托洛茨基所說的布爾什維克是個孤立的教派主義團體的觀點--托洛茨基即在1916年仍爲之辯護的觀點。〈20〉

1917-19年：蘇維埃權力與先鋒組織的綜合

二月革命爆發以後，列寧和托洛茨基立刻在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這個問題上，採取相同的觀點，這個觀點可以總結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中。列寧的"四月提綱"代表他本人的重要轉變，而且在開頭遇到"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反對。〈21〉可是，有意義的是，工人布爾什維克，即，無產階級幹部、工人先鋒份子，以及那些不是任何黨的黨員的人們，都支持列寧。這才使他可以克服領導層的抗拒。

在那個時候，托洛茨基改變了他過去以爲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孤立宗派的觀點。他認識到布爾什維克所訓練的工人們在二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22〉這個改變邏輯地導致他放棄了對孟什維克的調和主義態度，更加如此的是因爲，對於托洛茨基也對於列寧而言，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關於革命的未來路線的戰略分歧，是生與死的問題。這並不是次要的問題；這是革命成功或失敗的問題。〈23〉

在這個時候，似非而是的是，主張對孟什維克採取調和主義態度的，是某些"老布爾什維克"，如加米涅夫、斯大林及莫洛托夫。〈24〉接著而來的是，布爾什維克與托洛茨基的區際組織、（1913年成立的、包括盧那恰爾斯基、里亞扎諾夫、越飛和其他日後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麥日拉揚卡派（Mezhrayonka）之間非常快速的合併。列寧對這件事的判斷是："托洛茨基了解到與孟什維克統一是不可能的，從那時候開始，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25〉他從來沒有改變這個判斷。

作爲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作爲不倦的群眾鼓動者，作爲組織十月暴動、使用政治--鼓動方法帶來勝利的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因爲這個委員會說服彼得格勒警衛部隊接受蘇維埃的、不要接受資產階級參謀部的命令，托洛茨基在理論上掌握自我組織--先鋒黨關係的問題以前，已在實踐中解決了它了。這個解決方法由暴動與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同時舉行表達出來。這個暴動既不是陰謀，又不是小小少數人的政變。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個"工農國家"的決定，是大多數俄國工人和貧農的民主決定。〈26〉

只有通過布爾什維克黨在無產階級中的長期不變的、激勵人心和令人興奮的工作，才有可能將大多數

俄國工人們爭取到蘇維埃政權這邊。

不屬於布爾什維克的目擊者們已經完全證實了這點。〈27〉階級自我組織和先鋒黨的辯證統一在這裡達到了特別重要的成熟。

這是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對它的總結：

革命事件的動力是直接由階級心理的快速、劇烈的狂熱的變化所決定的。這些變化早在革命之前已經形成了。……

群眾們不是帶著一個準備好的社會重建計劃進入革命，而是帶著尖銳的、不能忍受舊政權的感情進入革命。只有一個階級的指導層份才有一份政治綱領，即使有了這個，仍然需要事件的考驗和群眾的贊許。因此，革命的基本政治過程，是由一個階級逐漸地理解社會危機帶來的問題--群眾靠連續近似方法作出主動定位--所組成。……

只有研究了群眾本身的政治進程，我們才能夠了解那些我們最不傾向於忽視的黨派和領導人的角色。他們是這個進程的並非獨立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組成部份。沒有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飛散去了，像沒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28〉

階級自我組織和先鋒黨活動之間的辯證統一和互相豐富化，在1917年以後在幼小蘇維埃制度的發展上、在紅軍的締造上，就非常明顯了。與蘇聯所流行的傳說完全不同，1918、1919兩年是俄國工人階級獨立活動的高點，甚至比1917年還要高。有許多文件、新聞報道和文學作品證實這點。〈29〉一個不大常有的見證人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是一位十分仇視十月革命的知名人物。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島》中報道了監獄看守所的蘇維埃怎樣為出於良心拒絕服役、而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的人進行干涉，迫使法庭改變它的判決。〈30〉你在近代國家的歷史上還能找到另一個國家有這樣的大眾民主嗎？它今天在那一個國家存在呢？

托洛茨基在以上的引句中，用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描述了"黨的領導角色"這個問題。沒有這種領導角色，則群眾運動的強大潛力，由於容易變動，就有飛散的危險。但是這個領導角色，並不是像普列哈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所描述的那樣，是"生出來就有的權利"。它必須繼續不斷地通過政治鬥爭，民主地爭取過來；大多數工人必須要被說服，他們必須要同意。只有在爭取這個多數的鬥爭中，黨的領導角色才能實現。黨的政策、綱領，既不是永遠沒犯錯誤，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們通過實踐

的考驗而改變，它們是被事件所改正。黨是群眾自我活動的伴隨物。

"黑暗年份"1920-21年： 托洛茨基的"代替主義"

為了階級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領導層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能夠得到實現，必須有一個自我活動的工人階級，或者在工人階級中至少有一個自我活動的廣大的先鋒隊。本書的前面已經指出過，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不斷地實現這件事的。

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接著它的所有其他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證實了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連續的自我活動，也不是自動發生的。這些社會的局面也有落潮和漲潮。它在大革命的激變時期達到了高潮（這在事實上是一個同義反覆）。當革命過程越過了它的高潮時，它就後退了。俄國在內戰結束時，即在1920-21年時期，達到了這樣的轉折點。

調查研究這個轉折點的政治-心理來源會有些興趣。人們不能夠經年累月地生活在連續不斷的高度緊張、劇烈活動的狀態中。偶爾的休息幾乎是生理的需要。但是比這種概括更重要的，是對引起這個群眾政治活動衰退的、具體的物質、社會生活條件，作一個分析。

在1920-1921年的俄國，以下這些情況現在是眾所週知，而且已經有許多作者描述過：

- （1）由於工業在內戰中受到破壞，以致生產力大降，無產階級的數量大為減少；
- （2）由於無產階級的最好份子參加了紅軍和蘇維埃國家機構，它的質素也大為減弱；
- （3）工人們的動機有了尖銳的轉變，他們的興趣集中在眼前的日常需要、保持生命、尋找食物等等；
- （4）由於國外沒有勝利的革命，人們對勝利的革命會導致他們的生活情況快速的改進，越來越不抱幻想；
- （5）不夠格的文化水平限制了通過蘇維埃直接行使權力的可能性。

在這一連串的原因中，有二個緊要的環節現在遭到破裂點了。這個國家的落後革命之孤立於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中，嚴重地限制了俄國工人階級自我活動的範圍，換句話說，嚴重地限制了這個階級真正行使權力的機會。黨沒有領導工人階級行使權力，反而漸增地以這個階級的名義來統治。

在這些困難年份的某一段緊要時期中，這個變化也許是無可避免的。工人階級已經縮小到只有1917年的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工人反對派前領導人、工人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半諷

刺、半嚴肅地對列寧說："我祝賀你，列寧同志，你現在以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名義行使無產階級專政了。"<31>

但是這個缺陷是時局的影響，並不是結構上有什麼問題--這些事情我們今天看來當然會比當時清楚得多。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引進，工業和工人階級都開始增長。根據官方歷史，工人階級的數量在1926年就達到而且超過1917年的水平。根據反對派資料，這事實上已經在更早時候達到。不過準確的數字不具有決定意義，重要的是，佔優勢的傾向明顯是朝向階級力量的重建和增長。所以，主要問題是，由於俄國工人階級從1922年開始在質與量上的"增長"，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具體政治措施，它在行使權力問題上的中期、長期戰略，是否促進或阻礙工人階級的自我活動。

今天，這個問題的答覆似乎清楚：從1920-21年開始，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戰略，阻礙了、不是促進了俄國工人們的自我活動。更有甚者，在理論上為這個"代替主義"辯護，以及將它普遍化，使情況變得更壞。這在實際措施上確實是如此：除了蘇維埃共產黨以外禁止所有蘇維埃政黨的活動和禁止蘇共黨內的派系活動。托洛茨基在晚年對這個問題作了一個不會被誤解的自我批評：

反對黨被禁止活動之後，就帶來了派系活動的禁止。派系活動被禁止的結果，就是思想不得與永不犯錯誤的領導人不同。黨的這種靠警察來維持的大一統極權統治，就造成了官僚的免受懲罰。這個免受懲罰已經變成各種各樣的揮霍浪費、貪污腐化的泉源。

<32>

托洛茨基，與黨的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投票贊成這些措施，而且為它們辯護了許多年。但是這些措施是無可辯護的，特別是它們在內戰結束後才開始實施的。從長期看來，這個代替主義的理論辯解更令人可怕，雖然托洛茨基沒有像列寧那樣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說明它，而且不像列寧那樣談論沒有階級力量的工人或者他們的長期無能行使權力。托洛茨基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說：

今天我們從波蘭政府接到一個締結和約的建議。誰決定這樣的問題？我們有人民委員會議，但是它也必須受到某些管制。

誰來管制？由工人階級以一個沒有形式、混亂的群體來管制嗎？不，由黨的中央委員會開會來討論這個建議，而且作出是否應當回答它的決定。當我們要進行戰爭、組織新的軍團、替它們找人馬的時候，我們問誰？我們問黨。問中央委員會。它就會在指派共產黨員到前線去的問題上向每個地方委員會發指令。

對農業問題、供應問題及所有其他問題都是這樣。<33>

更壞的是，托洛茨基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對工人反對派作出如此的攻擊：

工人反對派提出了危險的口號。他們盲目崇拜民主原則。可以說，他們已把工人選舉代表的權利放在黨之上，好像黨沒有權利維護它的專政，即使那個專政暫時與工人們正在發生的民主心境相衝突。<34>

同樣地，他贊成工人國家--"無產階級的斯巴達"--有暫時的權利，使用徵用制和勞動軍事化，作為一個強加勞動紀律的工具。<35>可是，這些不正確的觀點，對他在工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歷史神話，我將會在第八章中討論）爭論中的建議，只有次要的影響。同樣地，用暴力征服格魯吉亞的問題，既不能夠歸因於托洛茨基的主動，也不能夠歸因於他的暫時脫離常規的"代替主義"。斯大林對於這個問題應負直接的責任。

但是，仍然是事實的是，在托洛茨基於1920-21年發表的文告中，在他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這當然是他最壞的書）一書中，他辯護、保衛代替主義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它的政治、社會的後果。<36>不再談到蘇維埃的獨立作用或黨與國家的分離。

在各種各樣的共產黨內部的假正統的（保守和教條的）圈子中，1989-90年的事件被看成為對代替主義正確性的隨後證明。黨內"毫無紀律的"討論不在人民中必然引致政治分歧、終於破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嗎？政治多元化和自由選舉不是對反社會主義勢力如虎添翼、導致工農政權被推翻和資本主義復辟嗎？歷史沒有證明：只有大一統的共產黨才能保持工農政權，前後一致地使用國家機構來向這個目的前進，不受政治上不成熟、容易被反革命勢力操縱的工人階級的任何自我活動所分心嗎？

可是，這不是從官僚專政的崩潰所學到的教訓。這個崩潰是無可避免的。1989-90年東歐的事件和中國制度的嚴重危機證明：從長期看來，沒有工人階級自覺的支持、合作和自我活動，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案是不可能的。人民不甘受到操縱、奮起反抗，是遲早不可避免的。用鎮壓來對付這種反抗，不但是非社會主義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正如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例子所顯示的，它也是沒有效力的。它只會把群眾推向資產階級政客的懷抱中。斯大林主義、新斯大林主義不是抗拒復辟傾向的方法。它們只會引致日益增大的危機和爆炸。它們是沒有前途的。

黨內民主：作為到達蘇維埃民主的一道橋樑

1923年，托洛茨基開始認識到他曾在1921年在理

論上為它的開端辯護的那個官僚化過程的危險。比列寧遲些，但是更堅持不懈地，他開始與它抗爭，而且他開始在他認為成功機會最大的地方進行這個戰鬥，那就是在黨內。

爭取黨內民主，被左派反對派看成為爭取蘇維埃民主的必經橋樑。在那時候，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們仍然不願意同時向黨內、外的工人們呼籲。他們甚至於更不願意超越黨領導層而向非黨的工人們呼籲。他們在後來才採取這一步驟。他們在這時候的行為並不是一個"中派主義"躊躇不前的例子。它的根基，是對俄國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程度基本上悲觀的估計。換句話說，他們的估計是，俄國革命已經進入後退階段。在這種情況之下，使工人民主（蘇維埃民主）復甦的刺激，必須來自黨。只有黨才可以創造使蘇維埃民主逐漸復甦的條件。

托洛茨基的由1923年的第一個左派反對派"四十六人集團"所發動的攻勢，似乎有點成功。政治局同意他的建議。可是，在實際上，以斯大林為中心的黨機構，在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的支持下，特別是齊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包括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和其他人在內，開始發動一個有系統地窒息反對派的運動，禁止討論，壓制幹部和普通黨員的獨立思想，而且在"民主集中制"的掩護下強使他們服從和遵奉。

這是完全不合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國共產黨的傳統的。十五年來（不管斯大林主義者和反列寧主義者所宣傳的歷史神話是怎樣說），這個黨曾經允許自由地而且常常是公開的討論和不同觀點的交鋒。1923年所發生的，是從民主集中制到官僚集中制的轉變。

扼殺黨內民主的組織工具，是黨的官員由上面指派、不由黨員民主選出的制度。這個過程在社會上的表現，就是由專職人員管理的機構的快速增長。革命剛成功時，專職官員少於一千人，但是到了1922年，這個數字增加了十倍；不久以後，一百倍。這個機構自身獨立自主，而且在蘇維埃社會中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層份--蘇維埃官僚層。〈37〉

從這些情況看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之企圖復活黨內民主，是幻想嗎？它的成功希望，當然比企圖一下子使理想破滅了的、大部份是被動的工人群眾恢復活力，大得多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所做的是，向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良知、傳統和性格呼籲，向它的感受性、它的理論修養呼籲。這個企圖失敗了。由這個失敗而來的悲劇是，這個領導層終於了解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危險，但是不幸的是他們不是同時了解這點，而且在多數的情況中是太遲了。他們為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蘇聯工人、國際工人階級以及整

個蘇聯社會也為此作出了無數次的不必要的犧牲，包括犧牲了許多生命。

最後的綜合

從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為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問題，即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問題，費心了十年。他也對嚴謹地考察階級自我組織與先鋒黨之間的關係感興趣，特別是鑒於第一個工人國家官僚墮落的經驗。但是，他走得比這更遠。托洛茨基在法西斯主義在德國興起之後，其實在對1926年英國總罷工作出評價時，就已經開始對階級、群眾工會、會議和工人政黨之間的關係，作出了確定的結論，這些結論最後被1936-37年西班牙革命的悲慘經驗所證實。它們可以總結在以下的論點中：

（1）工人階級，就其社會層次、階級意識而言，都不是均一的。它的相對的不均一性，意味著這樣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意味著這樣的必然性的話）：許多個政黨和傾向會發展起來，而且會受到這部份或那部份工人階級支持。

（2）工人階級為當前的經濟、政治目標（譬如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而進行的日常鬥爭，它的成功，需要工人階級在行動上有高度的團結。因此，它需要能夠包括不同政治信念、不同組織隸屬的工人在內的組織，換句話說，以包括不同傾向和政黨的聯合陣線為基礎的組織。群眾工會和會議（蘇維埃）都是這種組織的例子。西班牙內戰中的、特別是卡塔盧尼亞的民兵委員會，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3）即使這種群眾組織局部地、或者甚至於長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受著與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社會）融合的機構所領導，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只是操縱、控制工人階級的形式。這些群眾組織具有矛盾的性質，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階級解放和自我活動的潛在工具。它們是"資產階級民主之內的無產階級民主的種子"。

（4）革命先鋒黨，由於它在綱領、戰略和實施上以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建立社會主義無階級社會為其目標，來保衛、代表工人階級的眼前和歷史的利益，所以在基本上與其他工人政黨不同。這件事情的經典公式已經列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它在今天仍然有效：

共產黨人不形成一個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對立的、分離的政黨。他們沒有任何與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他們自己的宗派原則，來塑造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人只在以下這二點上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不同：（1）在不同國家的無產

階級的民族鬥爭中，他們指出並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獨立於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2）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時所必須通過的各個發展階段中，他們總是並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每國工人階級政黨中最先進的、最堅決的、推動所有其他人前進的部份；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廣大的無產階級佔優勢的地方在於他們清楚地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行進路線、條件和最終的一般結果。〈38〉

但是，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說服大多數工人階級確信黨的綱領、戰略和目前政治路線的正確性。這只能用政治的、不是行政的手段來做。除了別的事情以外，它還需要正確地運用無產階級聯合陣線的策略。〈39〉

這就反過來要看革命社會主義者們在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政黨、其他組織交往時，是否能夠將堅持原則、堅決保衛他們的綱領和政治觀點--這些做法也需要尖銳地譴責理論上的、實踐上的機會主義--與公開對話、最低限度的忍耐力結合起來。

（5）同樣規則在細節上作適當修改後，也適用於工人國家的建造和行使的政權的形式上（除了受到內戰威脅的情況之外）。黨之實現領導的角色，是靠政治說服的過程，並不是靠行政措施，當然不是靠鎮壓某部份工人階級。它的實現只能靠應用過去東德人一直在說的"可供租用的原則"到政治上去。這就意味著：國家與黨的嚴格分離；由勞動人民民主地選舉出來的機關，不是由先鋒黨來直接行使權力；多黨制--工人們和農民們必須能夠自由地選出他們所屬意的人。

（6）社會主義民主、工會內部民主和黨內民主（組織派系、傾向的權利）有相互影響的作用。它們不是抽象的模式，而是有效地進行工人鬥爭、有效地建立社會主義的實際先決條件。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聯合陣線以及工人鬥爭因而成功，在最好情況下會很困難，在最壞情況下就不可能了。〈40〉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自從這些論點在1931年到1936年之間首次以公式表達以來，沒有一件在東方、西方發展的事情會對它們的正確性加上了疑問號。〈41〉剛好相反，日後在資本主義國家及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已經完全證實了它們的歷史的和理論的相關性。托洛茨基已在1925年寫過：

我們切莫不要靠官僚道路來建立社會主義。我們切莫不要用行政命令來創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只有通過千百萬群眾意識到、了解到這是他們自己切身事情的意見和意志的最大創意力、個別活動、堅持不懈

和迅速恢復的能力……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42〉

註釋：

- 〈1〉 恩格斯討論這個問題的最重要文字見於包括他從1890年到1895年的文章的Marx Engels Werke〔馬恩全集〕第22卷上。也可參閱《馬恩全集》第35-38卷中他在1892-95年時期與歐洲、北美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代表們的通訊。
- 〈2〉 格拉姆西討論這個問題的最重要文章，不是他的獄中書信，而是他在1919-21年在Ordine Nuovo〔新法令報〕上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一部份可以在A·格拉姆西的《政治論文選集，1910-1920年》（倫敦1977年）中找到。
- 〈3〉 托洛茨基爲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寫了他的《西伯利亞代表團的報告》。它已有法文版（讀者可參閱該書第87-8頁），而且也被Norman Gera在他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參與》一文中討論過。該文收集在G. Parry所編的《政治的參與》，曼徹斯特1972年。
- 〈4〉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一次分裂是暫時的分裂。這次分裂在1906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上被克服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事實上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個"公開派別"，不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它們只在1912年以後才真正地分開。
- 〈5〉 引自伊薩克·多伊徹的《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90頁。
- 〈6〉 見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哈佛1960年；及《先知三部曲》的第一卷《武裝的先知》。
- 〈7〉 見《革命的良知》。
- 〈8〉 關於革命智識份子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帶到工人運動中來這個常常被人從列寧的《怎麼辦？》中引來的公式，其實是起源自考茨基和Victor Adler（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所謂Hains Felder綱領中）。
- 〈9〉 "十二年"文集的序言，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103頁。
- 〈10〉 引自《我們的任務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9-20頁。
- 〈11〉 "我記得有人在列寧面前說：'赫魯斯塔列夫的星正在暗淡而現在在蘇維埃中的強人是托洛茨基。'列寧的臉色沉了一下，然後說：'喔，托洛茨基已經用他的卓越、不鬆懈的工作爭得這點'"（盧那恰爾斯基的《革命家們的剪影》，倫敦1967年，第60頁）。
- 〈12〉 "前布爾什維克派的代表們向黨的一個呼籲"，《列寧全集》，第十卷，第314頁。

- <13> 注意以下這一點會引起興趣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在1934-38年建立一個非法政黨時它所運用的組織原則相似於列寧所發展的那些原則。
- <14> 眾所週知，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對能夠實現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國家（政府）形式有三種觀點。孟什維克認為，這些任務能夠由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來實現，而這個政府應該得到社會民主工黨的支持。這種批評性的支持可以一直維持到〔與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布爾什維克所支持的觀點是，工人們，在與農民們的聯盟中，應該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架構中行使政權（“工農民主專政”）。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工人國家（在貧農支持下）才能夠實現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 <15> 黨的領導成員、蘇聯外交家越飛在自殺前致托洛茨基的遺書中直截了當地聲明，列寧告訴他，自從1906年以來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的問題上一直是對的。
- <16> 見Jane Degras的《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第一卷（倫敦1960年）中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會議組成條件的提綱；也見於卡爾·科爾施的《Schriften zur Sozialistischen Bewegung》〔《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69年。
- <17> 美國社會主義者Daniel De Leon〔丹尼爾·德里昂〕也得出了相似的觀念，雖然沒有這麼系統化。
- <18> 見Geras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參與”。
- <19> 見George Haupt的《Correspondence entre Lenine et Camille Huysmans》〔《列寧與Camille Huysmans之間的通信》〕，巴黎1963年，第130頁。〕
- <20> 俄國1912年以後勞工鬥爭的增加無疑是布爾什維克的繼續存在和活動所助長的。
- <21> 關於“老布爾什維克們”之抗拒列寧的提綱，見Marcel Liebmann的《Le Leninisme sous Lenine》〔《列寧生時的列寧主義》〕，巴黎1973年，第一卷，第1頁。
- <22> 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Sphere Books版的三卷本1967年），第一卷，第167頁。
- <23> “現在還說‘工農革命專政’的人是落在時代之後了。……那個人應該被送進‘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古物的檔案室（也許可以稱為‘老布爾什維克’檔案室）中去”。（列寧的“關於策略的信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5頁）。
- <24> 見Roy Medvedev的《讓歷史判斷》，牛津1989年，從第43頁開始。
- <25> 引自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偽造學校》，紐約1971年，第105頁。
- <26> 這事的證據，不但可在第二次、第三次蘇維埃大會的自由選舉的結果中找到，而且也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找到，因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市鎮中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投向贊成蘇維埃政權的黨派。
- <27> 見W. Sukhanov（蘇哈諾夫）的《俄國1917年革命》，紐約1962年，第二卷，第529頁。
- <28> 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16頁。
- <29> 見Victor Serge（維多·綏奇）的《革命的第一年》，倫敦1972年；及Alfred Rosmer的《列寧治理下的莫斯科》，倫敦1971年。
- <30>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倫敦1974年，第305頁。
- <31> 關於工人反對派的事蹟，見柯倫泰的《工人反對派》，倫敦1962年；也見她的《選集》，倫敦1977年（第五章“工人反對派”）。
- <32> 《被背叛的革命》，第104-105頁。
- <33> “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演說”，《共產國際的頭五年》，紐約1945年及1972年，第99頁。
- <34> 引自多伊徹的《武裝的先知》，第508-9頁。
- <35> 出處與上同。
- <36> 伊薩克·多伊徹在他的《武裝的先知》第十四章中舉了許多托洛茨基在1920-21年時期的“代替主義”的例子。
- <37> 中央委員會的一位重要成員、托洛茨基的親密朋友和在左派反對派的合作者，賴可夫斯基在（1928年所寫的）“專業人員的權力的危險”一文中，對這個過程，作了無與倫比的報告。該文收集在《蘇聯的反對派論文選集，1923-1930年》，倫敦1980年，從第124頁開始。
- <38> 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倫敦1968年，第46頁。
- <39> 這些論點的清晰的政治表達是在《過渡綱領（1933年）》中。該綱領收集在《第四國際1933-1940年成長年份的文件》，紐約1973年。
- <40> 這些論點是在托洛茨基關於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著作中具體地發展起來的。見《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紐約1971年；《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紐約1973年；《托洛茨基論法國》，紐約1973年。他的關於英國、關於1926年總罷工的文章刊在《托洛茨基論英國的著作》，第二卷，倫敦1974年。
- <41> 第四國際在它的第十二次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性文件《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中，已系統地把這些論點整理進去。
- <42> 引自Irving Howe著的《托洛茨基》，倫敦1978年，第110頁。

Safety Hazards in China

Zhang Kai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grave industrial accidents, such as coalmine explosions, have taken place and have caused concern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wo years ago, in October Review, No.202, I wrote an article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in which I pointed out that while China accelerates the market economy, the scramble for profits causes enterprise owners and the management to go for production at the expense of safety. The article carried concrete examples of casualties.

More casualties have accompanied China's market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1, over 1 million accidents happened with 130,000 deaths, an increase of 20.5% and 10.4% respectively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Of this, industrial and coalmine hazards numbered 11,402, with 12,554 deaths.¹

In the months of January to May 2002,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nd deaths had increased by 9% and 5.8%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the preceding year.²

The Beijing Youth Newspaper published an editorial entitled "The alliance of capital and power is the prime culprit for coalmine disasters". It quoted the words of Tian Chengping,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Shanxi Province, when he visited the site of the coalmine disaster: "production h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s violated the rules. Not one link was compliant with the rules. So many meetings on safety have been convened, but a lot of work cannot be implemented when it com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Perhaps, one would wonder why with so many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on safety, with so many inspections and issuance of government circulars, illegal coalmine extraction still continues causing severe accidents to become inevitable?

The editorial's reply to such questions wa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oalmine accidents is not because we do not have good policies, but because the policies and the regulations cannot be implemented." The editorial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local bureaucrats have a direct interest in the illegal mining, and when accidents happen, they make use of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to conceal the truths.³

The newspaper and the People's Daily of July 19 reported on some concrete examples of the inability to implement policies. For example, many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complained during national safety conferences that though they had issued production stoppage instructions, the instructions were ignored and illegal production continued. The Vice Premier Wu Bangguo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the major problem we encounter in our current production safety work is that we cannot be rigorous about it and policies cannot be implemented at the lower levels."⁴

This indicates the anarch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the merging of capital with the privileged bureaucracy. The government's governing power is also partially paralyzed. Faced with such a situation, the newspaper carries another article that appeared together with the editorial, entitled "Old model cannot well gover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article proposes a new coherent, systematized and self-regulatory scientific management system whereby the leadership and the enterprise will make a two-level pledge and a third party, the workers organization, will validate the rectifying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carry out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mechanisms, as well as safety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rescue systems.

On June 29,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Safety Production A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on November 1. With 96 clauses to the Act, according to People's Daily journalist Zhang Qiang, an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s will be set up. This mean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duction units, management staff and employees will b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and designated.

It is only after half a century since the PRC was set up that an act regulating safety production is introduced.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better to have some law than to have no law. However, it is doubtful if many of the clauses can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For example, it is stipulated that the employees have the right to refuse illegal or risky work, and have the right to stop work and evacuate from the site in case of discovery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yet there i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workers from being sack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economy, the enterprises enjoy full powers to recruit or dismiss workers. At a time when unemployment is serious, workers may choose to take the risk rather than quit the job. The trade unions, almost all of which are official, have the right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rectify measures that violate workers' legal rights, yet they do not have binding power on the enterprise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workers, nominally master of the country, do not have power over production or the running of th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are run by capital and political privilege combined. For workers to be able to exercise their power over production as well as social and national affairs, the Communist Party's one-party rule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of the bureaucrats must be abolished.

13 August 2002

1 Beijing Youth Newspaper, 4 July 2002.

2 China Youth Newspaper, 6 July 2002.

3 Beijing Youth Newspaper, 4 July 2002.

4 China Youth Newspaper, 6 July 2002.

HONG KONG

- 2 Deep mourning for loss of militant Zhang Ming ... *October Review*
2 Against Legislation for Article 23.... *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4 High officials shred responsibility..... Zhen Yan
7 How to face unemployment and other problems?..... Wei Bo

TAIWAN

- 9 The '1-side 1-country' theory..... Jun Xing

CHINA

- 11 Safety Hazards in China..... Zhang Kai
12 Liaoyang workers leaders still detained.... *China Labour Monitor*
13 Free Yang Jianli..... (reprint) Joint appeal from China
14 Dissident Zhao Changqing missing (reprint) *China Human Rights*
15 Letter to Jiang Zemin (reprint) Parents of Wang Bingchang
15 Letter to Jiang Zemin (reprint) Wife of Yue Wu

INTERNATIONAL

- 16 Where is US imperialism going?..... A.Thornett
18 Statement on 'Anti-terrorism War'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War

- 19 Questionable 'Anti-terrorism War in Philippines'..... Tison
20 US Army vehicle killed Korean girl (tr)Zhao Jing
20 Korean flag reflects the Korean people? (tr)Zhao Jing
21 The book *Escaping the North*..... (tr)Zhao Jing
22 Globalization and Palestinian..... N.Ibrahim, Dr.M.Nassar
24 What Arafat represents (tr)Wei Ran
26 Russia: signs of change A.Buzgalin
28 The Jewish question Zhao Jing
29 Impressions of the US Labor Party..... Zhao Jing
31 An International for humanity E.Mancuso
31 World Social Forum: great leap forward. Jourdin, Leclerc, Rousset
32 Argentina: the Commune lives O.Besancenot, F.Ollivier

SPECIAL ARTICLE

- 34 Trotsky as alternative (7)..... 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42 Safety Hazards in China.....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ctober_review@yahoo.com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第29卷 第3期 (總第210期)

2002年9月30日出版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柴灣新業街5號

王子工業大廈12樓

電話：2597 6800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目錄

香港	2	沉痛悼念張明戰士（1922-2002）..... 十月評論社同人
	2	反對23條立法..... 本刊評論員
	4	高官問責制自露出是對市民卸責制..... 振言
	7	如何應對失業等嚴重問題？..... 微波
台灣	9	「一邊一國論」出台前後..... 軍行
中國	11	生產安全 難有保障——兼評《生產安全法》..... 張開
	12	遼陽工人領袖仍被關押..... （轉載）中國勞工觀察
	13	釋放楊建利..... （轉載）中國西部五省市運界聯合呼籲
	14	籌辦全國聯署援救楊建利，異議人士趙常青失蹤，（轉載）中國人權
	15	王炳章父母致江澤民信..... （轉載）王俊禎、王桂芳
	15	岳武夫人致江澤民主席信..... （轉載）岳愛玲
國際	16	美帝國主義往何處去？..... 索尼特
	18	關於「反恐戰爭」的公開聲明..... 越戰退伍軍人全國反戰協會
	19	「菲律賓反恐戰爭」質疑..... 蒂松
	20	美軍車壓死韓少女事件與駐韓美軍地位協定..... 趙京譯
	20	太極旗是朝鮮民族的象徵嗎？..... 趙京譯
	21	韓元彩著《脫北者》介紹..... 瀧山五郎
	22	全球化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 阿伯拉罕、納賽爾博士
	24	阿拉法特：其人其事..... 蔚然摘譯
	26	俄國工人接管工廠的趨勢..... 布茲加林
	28	困擾蘇聯的猶太人問題..... 趙京
	29	（美國）勞動黨印象..... 趙京
	31	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 曼古蘇
	31	一次大飛躍：在巴西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喬丹、勒克拉克、魯塞特
	32	巴黎公社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貝薩塞諾、奧利維埃
特譯	34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七）..... 曼德爾
英譯	42	Safety Hazards in China..... Zhang Kai